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51期（民國95年3月），1-5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上海格致書院與「博覽會」的經驗*

吳方正**

摘　要

格致書院代表了 1870 年代企圖將西方科學與科技知識引入中國的諸多努力之一。書院的設置及構想與上海的西人社群密切相關，其中影響最大者為亞洲文會。

書院的原始規劃是透過公共圖書館與科學演講散播西方新知，在逐步擴大作為輔助教材的科學儀器與機械模型的規模後，書院計劃擴大成展覽與演講佔有重要地位的綜合科技學院。這個計畫包括三部份：讀書室、演講教學與具有教育性質的科學與科技展覽，其中展覽部份在書院籌設初期成為努力焦點。這是第一次在中國舉辦博覽會的嘗試。

在經過六年努力後，格致書院董事會放棄了展覽計畫，但作為開啓民智管道的博覽會所需條件卻在努力過程中逐一顯露出來，構成中國未來博覽會的重要經驗。本文因此將研究格致書院的焦點放在與圖書館、演講教學有關的博覽會。

關鍵詞：格致書院、亞洲文會、展覽、博覽會

* 本文之研究背景爲筆者在 2005 年 2 至 7 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訪問。對史語所與顏娟英教授在筆者研究期間的協助、討論與鼓勵，謹致誠摯謝忱。對兩位論文審查人、三位論文校對者，以及張寧教授提供的許多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05 年 10 月 2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 年 2 月 17 日。

**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副教授

前　言

如同文學作品(work)經過閱讀後成爲文本(text)，展示(display)也是在經過觀看後成爲展覽（展——覽）。放在體與用的框架下，展示的內容是主要的體，其形式只是表面，是呈現內容的用。換一個角度來看，展示的形式是導引觀者接觸到展示內容的途徑，因此理想的展示形式必須是透明的，讓觀者易於穿透的。然而，所有的展示都是再現，亦即按照某種規則（或編碼）呈現的，因此其觀看（或閱讀）並不是自動的，觀者必須熟悉或學習這個規則，以取得穿透表面進入的鑰匙，觀看與觀看的能力因而成爲展覽不可或缺的因素。[1]長久以來，學者們對博覽會的研究多半集中在博覽會「展示」了什麼？本文企圖透過格致書院籌辦「博覽會」的例子，探討中國在 1870 年代與博覽會概念接觸的過程，對當時中國博覽會的形成條件與博覽會潛在觀眾的觀看能力提出一些思考。

博覽會的功能可歸納成三大項：促進工商業發展、傳播新知與教育啓蒙、文化形象的再現。[2]其中，本文將關照第一與第三項，但將重點放在第二項，並納入博覽會的另一種形式——博物館——的研究。在研究中國博覽會史之前，我們通常要問：爲何中國自 1860 年代起即已揀送物品參加國際萬國博覽會，卻要等到 1910 年才真正自己舉辦了南洋勸業博覽會？[3]自 1860 至 1910 年，南洋勸業博覽會不能被視爲空轉五十年後從天而降，因此，上述五十年期

---

1 關於再現，見 Nelson Goodman, *Languages of Art: An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ymbol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76), pp. 3-6, 27-31; David Summers, "Representation," in R. S. Nelson & R. Shiff, eds.,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3-16.

2 Paul Greenhalgh, "Origins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Ephemeral Vistas: The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Great Exhibitions and World's Fairs, 1851-193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26.

3 Michael R. Godley, "China's World's Fair of 1910: Lessons from a Forgotten Event," *Modern Asian Studies* 12: 3 (1978), pp. 503-522；馬敏，〈清末第一次南洋勸業會評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頁 73-78；鍾少華，〈中國第一次博覽會：南洋勸業會〉，《歷史月刊》，期 41（1991 年 6 月），頁 98-103。

間所有關於博覽會的認識與誤解、阻擋、嘗試與挫折、那些不稱爲博覽會的展示、想辦沒辦成的博覽會等，都成爲中國真正第一次舉辦博覽會的準備、熱身與前驅。

就十九世紀下半至二十世紀初中國與博覽會關係的論題而言，我們所能搜尋的材料可分爲幾個大範圍：其一是中國官方檔案，其次是在中國發行的報刊與書籍，其三是其他相關國家對中國曾參與活動的記載。就第一個範圍而言，目前所知最大筆的資料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收藏的〈外交檔案〉中，彙編在「各國賽會公會」類別下的檔案。[4]在這個類別下區分了法制、典禮等 22 門，實際包括範圍超過單純的博覽會，兼及各種單項國際會議。值得注意的是，在原總理衙門與外務部〈外交檔案〉的總目下，「各國賽會公會」被當成涉外事件來看待，因此檔案的主要面向是國際關係。這份資料已有許多學者作不同程度的利用。整體而言，自 1866 年中國首次受邀參加法國巴黎博覽會至 1911 年之前，中國總共接到 287 次邀請。[5]在所有受邀或參加的「會」中，最大宗的是分散在各門中博覽會類的 80 次，其中清廷積極回應者 13 次。[6]就參與規模而言，中國參加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是最盛大的一次。[7]

4 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編，《外交檔案目錄彙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冊 1，編號 01-27，「各國賽會公會」，原總理各國事物衙門檔案，同治 5 年 7 月～民國元年 8 月；編號 02-20，「各國賽會公會」，原外務部檔案，光緒 27 年 8 月～民國 2 年 6 月。

5 古偉瀛，〈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個側面〉，《思與言》，卷 24 期 3（1986 年 9 月），頁 249-266；古文對 287 次受邀參與國際會議（包括博覽會）做了統計與分析，筆者歸納出值得注意的幾點：1. 受邀次數：整體而言隨時間增長，自 1866 以下數年受邀次數在 1 與 2 次間，1882-1884 年間出現小高峰，次數在 4-6 次之間，1893 與 1897 年出現兩個高峰，受邀次數分別爲 9 與 10 次，1904 年起受邀次數持續在 12 次以上，1908 年起更躍增到 26 次以上；2. 中國未接受邀請或狀況不詳者有 42%，積極參與者僅 12 次；3. 各國中以美國邀請 33 次最爲活躍（我們可能必須以「合眾國」的角度來看待美國的現象），中國鄰邦俄國與日本在國際會議上反而「與中國往來並不密切」；4. 就類別而分，次數最多者爲勸業門的 39 次；5. 賽會性質的改變如本文標題所示。

6 趙祐志，〈躍上國際舞台：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25（1997 年 6 月），頁 287-344；在清廷積極參與的 13 次中，1870 年代 3 次，1880 年代 3 次，如果將 1895 年受邀、1900 年參加的巴黎萬國賽奇會計入，則 1900 年之後中國參與次數爲 7 次，佔總數一半強。

7 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入黃克武主編，

〈外交檔案〉中第一件關於博覽會的紀錄始於同治 5 年(1866)，但絕大多數的紀錄落在光緒年間，如果我們觀察 1872 年發刊的《申報》，一直到 1910 年南洋勸業博覽會之前，在涵蓋〈外交檔案〉起訖年的《申報》中，與博覽會相關的報導呈現出一個相當不同的面貌。簡單地分類，《申報》中的報導可分爲三種：一是照登政府勸諭商民參加的公文，以及各國博覽會章程譯文，這個部份其實與官方檔案重疊；其二是對於博覽會的論說，其三是博覽會的實際參觀報導，這兩類文字是官方檔案所沒有的。非官方文獻中，本文參考的中文報刊除發行時間涵蓋面最廣的《申報》之外，另外參考 1868 年（同治 7 年）7 月創刊於上海、由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主編的《中國教會新報》（簡稱《教會新報》），以及由該報於 1874 年（同治 13 年）改名後的《萬國公報》。[8]這兩份資料或爲週報，或爲月刊，一方面補充 1872 年《申報》創刊之前的一段空檔，另一方面則可作爲《申報》的輔助資料。除了中文報刊外，本文參考在上海發行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9]這份發行年份由 1850 至 1941 年的週刊，可視爲與《申報》相呼應的上海西文報紙，提供了可與〈外交檔案〉、《申報》、《教會新報》與《萬國公報》相對照的博覽會資訊。

《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421-475；本文創新之處在於使用了我們歸類爲第三個資料範圍的主辦國史料。

8 《中國教會新報》(*The News of Churches*, or *The Church News*)爲週刊，由林樂知主編，英國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與艾約瑟(Joseph Edkins)佐其事，自 1868（同治 7 年）起發行 6 年，至同治 13 年改名《萬國公報》(*The Globe Magazine* or *A Review of the Times*)，仍由林樂知主編，1889（光緒 15 年）歸併廣學會發行。見〈景印「教會新報」、「萬國公報」緣起〉，《教會新報》（台北：華文書局，1968）。關於《萬國公報》對近代中國的影響，見梁元生，《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九章：《萬國公報》西學舉要，頁 392-417；黃新憲，〈《萬國公報》與中國教育的近代化〉，《南京師大學報》，1996 年第 1 期，頁 57-60；于醒民，〈《萬國公報》的主筆是林樂知嗎？〉，《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5 年第 1 期，頁 81-85；王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楊代春，〈《萬國公報》研究綜述〉，《湖南大學學報》，2001 年第 3 期，2005 年 2 月上網：http://www.cass.cn/jindaishisuo/show_News.asp?id=5924。

9 *The North-China Herald* 於 1850 年由美國人奚安門 Henry Shearman(?-1856)創辦，週六刊。1864 年英商字林洋行創辦 *North China Daily News*，時人稱《字林西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 成爲其星期附刊，1941 年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停刊。*The North China Herald* 中文名稱《北華捷報》由戈公振譯定。見馬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珍藏「西文漢學舊籍」簡介（三）〉，《史林》，2001 年第 4 期（總第 64 期），頁 108-109。

一、理想：格致書院的淵源與發軔

在《申報》與《萬國公報》中，除了中國傳統式的賽會、衒奇會與較新名詞或襲用自日本的博物院、博覽會的兩類博覽會稱謂外，1874 年出現了一個新名詞：「格致院」。1874 年 2 月初，《申報》以〈論美國擬設格致院事〉爲題，報導將於 1876 年舉行的美國費城博覽會：

> 西國最重爭奇鬥巧之會，故各國皆有特開賽院之舉，歷來西字日報常有刊列於紙者是也。今閱西字日報云，美國擬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在該國非拉得里弗城大設格致院於其間……。[10]

《申報》的資訊來源是《西字日報》，「格致院」這個名詞的使用大約與日本無關，可以指出的是博覽會被定義成「爭奇鬥巧之會」，各國舉行的博覽會在文中以「賽院」稱之，文中敘述先例提到前一年的維也納博覽會時，則稱之爲「博物賽院」，如此看來，作爲標題的「格致院」只在文中出現一次，反而顯得突兀。數週後，《申報》刊登前述上海道曉諭商民參加博覽會的告示，在這份中國官方文件中，費城博覽會被稱爲「賽奇公會」，維也納博覽會被稱爲「聚珍公會」，「格致院」這個名詞沒有進入官方字彙中作爲博覽會解。[11]同年 10 月，《申報》報導日本參加 1873 年維也納博覽會的成果，使用的描述是「西報論及去年日本人在奧國大格致院賽珍」。[12]有趣的是，資訊來源仍是西文報紙，這是巧合？或是「格致院」這個詞與某些居住上海的西人有關？

1874 年 6 月 18 日，《申報》報導上海將設立格致院。[13]根據稍早報上的用法，我們會以爲又是博覽會，事實上這個格致院後來發展成廣爲人知的格致書院。[14]格致書院從醞釀到 1876 年 6 月 22 日開幕，歷經二年有餘，其間書院

10 〈論美國擬設格致院事〉，《申報》，1874 年 2 月 3 日（西曆 3 月 20 日）。對於 1874 年 6 月之前《申報》以陰曆紀年月日者，本文加註西曆日期，無加註者皆爲西曆。

11 〈道憲曉諭美國賽奇開會告示〉，《申報》，1874 年 2 月 22 日（西曆 4 月 28 日）。

12 〈東人奧國賽珍〉，《申報》，1874 年 10 月 10 日。

13 〈滬上將設格致院〉，《申報》，1874 年 6 月 18 日。

14 Knight Biggerstaff,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董事共舉行 11 次會議。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對格致書院的設立有詳細的追蹤，我們可用以比對《申報》、《教會新報》與《萬國公報》的報導。

格致書院的成立應上溯到 1872 年初在北京設立的益智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15]北京益智會和 1834 年的前身——廣州益智會，皆仿自 1828 年英國同名機構。英國的學會原始目標是將有用的資訊傳播到社會中的所有階層，因此帶有強烈的推廣教育意味。《北華捷報》對北京益智會的報導則明言："Secular Missionaries are wanted"，透過廉價出版品傳播文學與科學，亦即此刻在中國主要目的是傳「世俗教」。[16]1872 年底上海西人呼應北京益智會的宗旨，建議傳教士設立讀書室(Reading Room)以吸引華人並傳播新知：

> ……依據我們構想的讀書室須提供中文古典書籍，與已譯為中文的實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hinese,"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5:2 (May 1956), 收入其專書 *Some Early Chinese Steps toward Modernization*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5), pp. 69-91；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刊（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15 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頁 5，王譯「北京廣學會」。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 551；1887 年成立的上海同文書會英文名"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2（熊文 1894）年易名廣學會，英文名至 1905 年改"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參見〈廣學會序〉，《萬國公報》，1892 年 2 月，頁 12597-12598。本文「益智會」中文譯名依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上冊，頁 78；郭文所指爲 1834 年由裨治文(E. C. Bridgman, 1801-1861)、郭士立(K. F. A. Gutzlaff, 1803-1851)創設於廣州的益智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關於 1834 年創設於廣州的益智會，見 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 and the Coming of the Millennium: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Knowing the Time, Knowing of A Time*, 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Millenni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December 6-8, 1998, pp. 7-8.

16 "A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Editorial Selections, *The North-China Herald*（以下簡稱 *N.-C. H.*）, Feb. 22, 1872, vol. XXV, p. 138。文中以 1832 年的英國與 1872 年的中國相較，明顯指涉 1832 年由英國益智會發行的 *Penny Magazine*。1872 年 4 月初，一位署名"Philo-Chinese"的讀者投書《北華捷報》論益智會事，建議道："…that it will not issue any publications of Christian doctrine, but confine itself to secular and scientific topics."見"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Correspondence, *N.-C. H.*, April. 4, 1872, vol. XXV, p. 268。這實際上將是格致書院初期的主要路線，1875 年，北京益智會第三年報告也將格致書院與其《格致彙編》當作與益智會、《中西見聞錄》(*The Peking Magazine*)同質的事業；見"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Miscellaneous, *N.-C. H.*, Dec. 23, 1875, vol. XV, New Series, p. 633；"Th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Public Meetings, *N.-C. H.*, Feb. 17,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 143。

用科學著作。牆上應掛著機器與現代發明的精緻圖片，以及所有能激發興趣、吸引觀者好奇心的事物。[17]

讀書室的性質其實是公共圖書館，相對於益智會的廣印書刊，讀書室更進一步地將想要散播的書刊聚集在一處。這個在西人社群中相當普遍的公共圖書館概念，在中國已是創舉。從文中看不出倡議者爲誰，但幾天後《北華捷報》再爲文相和，稱此事需要兩個條件：經費與熟練的經理者，後者最理想的人選則是構想的提出者——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18]麥華陀有何建議？兩個月後的《申報》報導：

上海一隅，各善舉雲起。今聞英領事麥公倡議開一宏文書院，以處華人，其意欲華人得悉泰西各學之門……凡西書之翻譯為漢文者皆備置院中，機器等亦各供列。內延博物之西士在院講論西學，以供眾聞。而除西書外，凡中國各堂新報及著名漢書概皆預備。其所需計本銀一千五百兩，此銀擬在中外商士捐湊。……聞唐君景星亦願於此出力……。[19]

之後，此事沈寂了有一年之久。想茲事體大，萬不是麥華陀一人可以成事。即使唐廷樞（景星）已表明協助之意，[20]這個協助也不太可能是「延博物之西

[17] "...that such a Reading Room as we conceive should be furnished with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such practical works on scientific subjects as have been well translated into native language. The walls should be hung with good pictures of machinery and modern inventions, and everything should be done to enlist the interest, and attract the curiosity of the visitors." "Secular Missionaries,"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Dec. 26, 1872, vol. IX, New Series, pp. 548-549。本文中所有《北華捷報》引文皆筆者自譯，筆者自負翻譯疏陋之責。

[18] "Reading Rooms for the Chinese," *N.-C. H.*, Jan. 2, 1873, vol. X, New Series, pp. 4-5。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85)爲著名英國傳教士、完全同名的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之子。麥都思 1837 年出版閩南語——英語辭典，1843 年在上海開設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麥華陀於 1860 年署英國駐上海領事，1865 年轉任漢口領事，1868 年再署上海領事，至 1876 年底退休返英。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 324。

[19] 〈宏文書院〉，《申報》，1873 年 2 月 27 日（西曆 3 月 25 日）。

[20] 唐廷樞(1832-1892)，字景星，廣東香山人，香港馬禮遜教育會學堂肄業，1870 年入怡和洋行，1873 年由李鴻章委派爲輪船招商局總辦，1877 年主持開平煤礦，並興建唐胥鐵路，1885 年起專管開平礦務局，在此之前兼輪船招商局總辦十餘年。沈毓桂，〈唐景星觀察傳〉，《萬國公報》，卷 6，光緒 18 年(1892)10-11 月，頁 13268-13271；汪敬虞，《唐廷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陳絳，〈唐廷樞與輪船招商局〉，《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2

士在院講論西學」之類的軟體建設，麥華陀需要上海有「博物之西士」的機構提供一個框架。書院（或讀書室）的建議一直要到 1874 年 2 月才在亞洲文會(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會議中被重新提出，會議決議項有三：設博物館、收集博物館所需的中國內地探查紀錄，以及爲體面的中國人開設的讀書室。[21]

此事與亞洲文會的牽連需要一些解釋。事實上，1858 年成立的亞洲文會多年來在上海居無定所，發展遲緩。[22]1868 至 1869 年間，英國政府在領事館附近圓明園路興造兩層樓的新屋，準備以免租金的方式撥交亞洲文會使用，受僱的建築師敬妥瑪(Th. W. Kingsmill)也是文會會員。[23]1872 年初新館完工，亞洲文會總算有了個固定的會址（圖一）。[24]自 1869 年起，新空間在望，使得亞洲文會規劃收購偉列亞力(Alexander Wylie)藏書，[25]與原有的亞洲文會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合併。[26]1872 年 1 月 11 日，亞洲文會舉行遷入新館後的第一

期，頁 31-64。

21 "The Asiatic Society,"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Feb. 26, 1874, vol. XII, New Series, pp. 173-174.

22 關於亞洲文會的初期史，見"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Oct. 30, 1873, vol. XI, New Series, pp. 361-362；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任主席裨治文(E. C. Bridgman, 1801-1861)即 1834 年在廣州設立益智會的美國傳教士。參見 Michael C. Lazich，"E. C. Bridgman and the Coming of the Millennium: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pp. 13-15。

23 敬妥瑪(Thomas William Kingsmill, 1837-1910)，英國人，早年來華，1887 年應山東巡撫聘，測量運河北段。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256，本書譯名金斯密。從《北華捷報》中零星所見，敬妥瑪在上海的共濟會中相當活躍。

24 "The Asiatic Society",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Jan. 18, 1872, vol. VIII, New Series, p. 37。本文使用 1909 年在上海出版的《圖畫日報》3 張圖版作爲插圖，不對插圖所隱含的 1909 年前後中國圖像重塑現實方式作分析探討。環球社編輯部編，《圖畫日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99）。

25 偉列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英國傳教士，漢學家。1847 年來華，在上海爲倫敦佈道會負責印刷聖經的工作，學識淵博，著作極多。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524。

26 亞洲文會圖書館與文會同始於 1858 年，見"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Oct. 30, 1873, vol. XI, New Series, p. 362。上海圖書館(Shanghai Library)成立於 1849 年，初期以租賃方式作爲藏書落腳處。在歷經 3 次遷移後，共濟會北華支會於 1856 年提供場所，圖書館遷入共濟會的上海總會(Shanghai Club)，至 1872 年與偉列亞力藏書併入亞洲文會圖書館，原上海總會圖書館(Free Club Library)仍保有部份藏書。見 Old Mortality, "Local History, and the Shanghai Library," Miscellaneous, *N.-C. H.*, Mar. 13, 1873, vol. IX, New Series, pp. 233-234。合併後的亞洲文會圖書館號稱中國第二大，僅次於北京俄羅斯傳教

次會議，會中規劃二樓空間將用來安置新的圖書館以及未來的博物館(museum)。在 1872 年初，博物館其實已有雛形，亞洲文會主席 C. W. Goodwin[27] 在引導眾人參觀二樓新圖書館時，滿載了文會藏品的箱子就放在圖書館中央的大桌上。[28]從《北華捷報》數年來報導的亞洲文會會員採集活動來看，這個博物館的原始核心是一個自然科學與人類學博物館的混合，它也是未來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前身。綜合 1872 年亞洲文會活動，1874 年 2 月亞洲文會的三個決議事項中，讀書室之外的兩項原本就在亞洲文會的計畫中。麥華陀企圖透過上海西人菁英社團推動與益智會性質相類的格致書院，亞洲文會似乎也難以拒絕贊助，而格致書院一開始便已經蘊含了亞洲文會的圖書館與博物館的影子。

1874 年 3 月 12 日，麥華陀以投書《北華捷報》的方式正式倡議成立此一讀書室，並附章程。章程第一條定名："The Reading Room shall be called 格致書院——Ko-chih Shu-yuan (School for Search after Knowledge)"，讀書室除提供書刊外，並有不定期科學演講，很清楚是個教育機構。[29]兩週後，一群熱心推動者在亞洲文會開籌備會，採納了麥華陀的計畫，並組成董事會以司募款並執行計畫，籌備委員包括麥華陀本人、亞洲文會主席福勃士(F. B. Forbes)[30]、偉列亞力、傅蘭雅(John Fryer)，以及華籍委員唐廷樞（景星）。[31]檢視這份名單，麥

團圖書館(Library of Russian Mission)。見"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Oct. 30, 1873, vol. XI, New Series, p. 362。

27 Charles Wycliff Goodwin(1817-1878)，律師、法官與埃及學學者，1872 年亞洲文會主席。"N.-C.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 Public Meetings, *N.-C. H.*, Jan. 18, 1872, vol. VIII, New Series, pp. 39-41；"Funeral of the Late C. W. Goodwin, Esq.," Miscellaneous, *N.-C. H.*, Jan. 24, 1878, vol. XX, New Series, p. 89.

28 "N.-C.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 Public Meetings, *N.-C. H.*, Jan. 18, 1872, vol. VIII, New Series, pp. 39-41.

29 W. H. Medhurst, "A Reading Room for the Chinese," Correspondence, *N.-C. H.*, Mar. 12, 1874, vol. XII, New Series, pp. 225-226。寫信日期為 3 月 5 日。章程中文譯本，見〈上海新設格致書院條款〉，《教會新報》，冊 6，1874，頁 3071-3072。

30 福勃士(Francis Blackwell Forbes, 1840-1908)，美國商人，1857 年來華，一度兼任瑞典駐上海領事，1873-1874 年亞洲文會會長。福氏是植物學愛好者，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147。

31 "A Reading Room for Chinese," *N.-C. H.*, Mar. 26, 1874, vol. XII, New Series, pp. 269-272。參加此次會議者，除推動書院最力的領事 W. H. Medhurst 之外，尚有《申報》創辦人 E. Major、稍晚

華陀是原始創議人，福勃士與偉列亞力是亞洲文會核心成員，唐廷樞在一年前即與麥華陀唱和，增加的是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傅蘭雅。偉列亞力與徐壽合譯的《汽機發軔》在 1871 年由江南製造局出版，因此傅蘭雅有可能因與偉列亞力的關係加入董事會。但作爲上海最重要的中國官方西書翻譯機構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傅蘭雅應早就熟識董事會中的其他成員。

1874 年 4 月 2 日，《北華捷報》對在亞洲文會館舉行的這個會議做了摘要與評述。麥華陀詳述了他的規劃，第一個重點是：讀書室將是全然世俗的，以一種新的方式「對無知的城堡展開攻擊」。麥華陀又說道，多年來在許多勤奮翻譯者的努力下，眾多關於工程、化學、數學與地理等實用性著作被譯成中文，隨著時間進展，接下來將是翻譯文學作品，透過這種方式，或許在未來可以改變這個民族的品味(national taste)，樹立新的模範(models)。在十九世紀此時，麥華陀顯然還未想到這樣的文化侵略有什麼問題。但是，撇開遠程的崇高目標，當務之急是先吸引世俗宣教者想要教育的群眾：讀書室必須以「工作機具模型、科學儀器、地圖與地球儀、書架上的書、桌上的報紙來吸引人。」[32]用來吸引群眾者已經由最早的機器與新發明的「圖片」，擴大到工作機具模型與科學器材「實物」。

第一次董事會於 1874 年 4 月 6 日在英國領事館舉行，董事 3 人，分別爲麥華陀、偉列亞力、唐廷樞。兩個月後，傅蘭雅與王錦堂加入董事會，其中前者將成爲書院的靈魂人物之一。在第二次董事會中，議定書院英文名稱更改爲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這個名稱仍仿自英國同名機構。[33]倫敦的

成立的上海（自然史）博物館負責人 W. B. Pryer 等，推測與會者大部份皆爲亞洲文會成員。

32 "It will have to attract by its working-models and scientific instruments, by its maps and its globes, as well as by the volumes on the shelves or the newspapers on its tables." "A Reading Room for Chinese,"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Apr. 2, 1874, vol. XII, New Series, p. 286.

33 "The Chinese Reading Room: Minutes of first Meeting of Committee...,"*N.-C. H.*, June 20, 1874, vol. XII, New Series, p. 560-561。報導中包含第一次（4 月 6 日）、第二次（6 月 11 日）董事會紀錄。第二次董事會紀錄中說道："...nothing less than a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resembling, on a small scale, the well-known establishment of that name in Regent Street, London, seemed at all adequate to meet the wants of the Chinese and the purpose the promoters had in view."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Arts and Practical Science)創立於 1838 年，目標爲透過展覽、科學研究、資助發明家、訓練勞工等，鼓勵將科學應用於工業製造。[34]很自然地，這令人聯想到江南製造局的需求。實際上，格致書院的英文名稱來自傅蘭雅，名稱的採用則來自第二次董事會中對書院定位的討論。[35]

格致書院英文名稱變更的意義至今尙未引起學者注意。稱書院爲 School for Search after Knowledge 時，它是「求智學校」。學校需要校舍、教師、學生、教科書，求智學校和中國傳統上通常只有文字教學的學校相較，僅多了一些用來輔佐教學的圖片。但稱書院爲 Polytechnic Institution，尤其是當它以倫敦同名機構爲藍本時，原來教學補充資料的重要性暴增；教學時由教科書的文字出發，文字不明處以檢視圖片查驗，圖片不明處以檢視實物查驗，實物不明處以拆卸、透視實物等方式查驗，各種物理化學實驗、生物解剖等亦同，這一連串的進程均仰賴視覺提供動力，簡言之，即是向知識的視覺化一步步邁進。這種方式和科舉仕子在白紙黑字間汲取知識相比，無異於知識體系的大革命。姑且不論進格致書院研究對科舉仕子有何幫助，或以格致書院爲唯一求學途徑時對仕途有何不利，這麼龐大的變動在沒有社會文化條件配合下，基本上是窒礙難行的。在此刻，包括徐壽與後來的李鴻章似乎都未曾體會到這層差異，由於「書院」兩字，格致書院長期以來被學者們當成中國書院的洋人版。

値得一提的是，倫敦的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的大廳就是一間展示機械器物——亦即將科學應用於工業製造的成果——的大鐵屋，這實際上也可說是萬國博覽會科技部份具體而微的常設展，格致書院在改名爲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後，多少已有向英國同名機構看齊之意。

---

34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http://wwwedit.wmin.ac.uk/static/history.asp.

35 見格致書院開幕式麥華陀致詞，"Opening of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N.-C. H.*, June 24,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 617.

二、兩難：籌設方向的偏滑

至格致書院開幕前，一共出現過三份書院英文章程。第一份爲前述英領事麥華陀刊載於《北華捷報》者，對象是旅滬西人，其餘兩份陸續由傅蘭雅編擬，對象是英國與歐洲商人。最早的一份中文章程則由徐壽擬具，對象是中國人。[36]對象的不同導致章程內容有異，就本文關心的面向，博覽會是書院用來吸引西商贊助的手段，因此我們將注意力大部份放在英文章程上。第一份麥華陀章程的第九條說明書院設備，第一部份是書，包括中文報刊、譯成中文的經典西洋著作、西洋作者以中文書寫的一般書籍（亦即非宗教書籍）等，此外，書院將配備地圖、各種科學儀器、蒸汽機與火車模型、電報器具等。[37]在之後的章程中，書報以外設備的重要性不斷膨脹，幾乎掩蓋了讀書室的原始目的。

在書院董事會第一次會議中，麥華陀與唐廷樞分別負責向中西商人募款。1873 年，英國 Ransonmess & Rapier 公司計劃興建鐵路獻給清廷作爲光緒大婚的禮物，[38]麥華陀在第一次董事會中，受託聯絡在英國主事獻禮的委員會，爲書院募款。[39]在第二次董事會中，麥華陀報告對上次會議決議的執行狀況，說明已寄信前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Sir Rutherford Alcock)；[40]另一方面，由於募集的款項不足以購買書院所需的儀器、模型等，董事會決議向英國國內製造商要求贈送或「出借」這些事物，預料後者將樂於將其貨品呈現在中國大眾面前，

36 〈擬舉辦格致書院上李相伯稟稿〉，並章程六條及李鴻章批示，《申報》，1874 年 11 月 11 日。

37 再引 W. H. Medhurst, "A Reading Room for the Chinese"。

38 宓汝成編，《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清同治 2 年——光緒 26 年(1863-1900)，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40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上冊，頁 18-19；〈洋人議獻火車鐵路論〉，《申報》，1873 年 7 月 8 日（西曆 8 月 30 日）；"Mandarins and Railways,"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July 19, 1873, vol. XI, New Series, p. 44；"The Proposed Gift Railway for China,"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Aug. 9, 1873, vol. XI, New Series, p. 109。

39 "The Chinese Reading Room: Minutes of first Meeting of Committee…," *N.-C. H.*, June 20, 1874, vol. XII, New Series, p. 560。

40 阿禮國(Sir 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1865-1871 年間英國駐華公使，1871 年退休返英，在 1873 年的「婚禮鐵路」中扮演重要角色；"The Gift Railway to the Emperor," Leading Article, *N.-C. H.*, Aug. 19, 1873, vol. XI, New Series, p. 169-170。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6。

並因此促進其商業的拓展。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傅蘭雅重新擬就一份新章程，將章程寄給倫敦的 John Bourne & Co.，後者受託成為董事會在英國國內的代辦，負責聯絡英國各製造商。在新（第二份）章程中，傅蘭雅說：

> 當我們考量這個廣大群眾的需要，以及這個國家龐大但幾乎不為人知的資源，我們很容易見到如此一個書院是以可以賦予當地人以及歐洲製造商與商人的利益來構想的。上海——作為與中國人貿易的大中心——是最適宜建立這樣一個機構的地點。[41]

若無說明，許多人會以為這段話的前幾句是在二十一世紀初說的。我們可以回頭檢驗《申報》中的報導。《申報》在 1874 年 6 月 18 日第一次報導〈滬上將設格致院〉，已在麥華陀將書院定名為格致書院之後三個月，為何仍稱之為格致院？尤其在《申報》業主美查(E. Major)也曾參與董事會籌備會的狀況下？根據文中對此事沿革的敘述，英領事麥華陀首先「大聚商人」創議設院；2 月 22 日（陰曆）開第一次董事會，議定除了由麥領事與唐景星分別向西商與華商捐貲、增請上海道翻譯員王君（錦堂）為董事外，[42]「麥領事又許致函於英國，先請將火輪車及鐵路一事贈於中國試用之」。2 月 25 日（陰曆）再開董事會，與會者有炮局（江南製造局）翻譯員弗來亞（傅蘭雅）、偉烈（亞力）、麥領事與王君（錦堂），商議「在外國租界南首與滬城相近之處覓購隙

41 "When the wants of this enormous population, as well as the immense, but hitherto almost latent, resources of that country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t is easy to see the great advantages that an Institution of the kind is calculated to confer both upon the natives generally and upon European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Shanghai, being the great centre of Foreign commerce with the Chinese, is manifestly the most suitable locality for this establishment." "Prospectus of 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Public Meetings, *N.-C. H.*, Oct. 22, 1874, vol. XIII, New Series, p. 399。傅蘭雅的這份簡章附在《北華捷報》對 1874 年 10 月 22 日第四次董事會的報導之後，但若根據該報於 1875 年 10 月 14 日所登載傅蘭雅所撰書院董事會報告，這份簡章出自第二次董事會。見"The Polytechnic- Report," Public Meetings, *N.-C. H.*, Oct. 14, 1875, vol. XV, New Series, p. 379。

42 〈滬上將設格致院〉，《申報》，1874 年 6 月 18 日。《申報》報導未列出王錦堂名字，但說明他是「道憲繙譯員」。上海道台的翻譯員王錦堂與道台管轄的江南製造局翻譯員傅蘭雅涉入格致書院的規劃，此刻上海道台馮焌光可能已知情。關於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上海道台與李鴻章的關係，見梁元生著，陳同譯，《上海道台研究：轉變社會中之聯繫人物，1843-18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86-87、100-108。

地一塊以便建屋，蓋以此法支用其銀可免月出租費」，此議因華商捐銀未到而擱置。《申報》6 月 18 日報導，董事會做出建議「致函於英國造作機器局，請其將機器貯於院內，既可乘機出售，則不需於未售之先索值」。[43]綜合上述，「大聚商人」意味著此事與商業關係較密切；麥華陀向英國的鐵路公司募款一事，變成向英商索贈火車與鐵路；如果不購地，場地將按月付租，亦即隨時可撤的機構；院中擺設機器出售，這是工商博覽會。最後這點雖然不見於《北華捷報》報導的董事會議紀錄中，但傅蘭雅章程的寫法確實令人朝這個方向想。

在中國開始參與國際萬國博覽會的背景下，辦工商博覽會並不是一個空穴來風的想法。1872 年 5 月，在亞洲文會的一場例行聚會中，會員們談海南島、談牛莊煤的開發，接著會員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44]談到在北京、寧波等地常有一些珍奇商品的展覽(exhibitions of commodities of curiosity and value)。瑪高溫因而認爲有可能在上海舉辦一個展覽(Art Exhibition)。另一位會員衛三畏(Dr. S. W. Williams)[45]接著對北京的“Exhibition or fairs”發表了一些觀感。[46]在亞洲文會會員們的辭彙定義中，“Art”保有十八世紀之前藝術與技術尚未分離之際「可傳承的技藝」的意義，作爲與自然物產相對的人造物。在這個時期，“Art and Science”並不具有今天「藝術與科學」的意義，而通常更廣泛地指工業技術與科學。因此，在北京與寧波的這些珍奇物品展覽是博覽會。亞洲文會主席福勃士最後允諾瑪高溫：文會會議將會注意這件「在上海辦博覽會」的事。

---

43 〈滬上將設格致院〉，《申報》，1874 年 6 月 18 日。這份報導綜合了書院第一、二次董事會的記述，比 *The North China Herald* 的相同報導早兩日刊出，但後者並無《申報》所稱陰曆 2 月 25 日董事會議的記載。

44 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1893)，美國浸信會傳教醫師。1843 年來華，在寧波傳教行醫，次年創辦醫院，旋即停閉。1862 年回美，在南北戰爭中充軍醫，戰事結束後返華。1879 年，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派瑪高溫在溫州海關任幫辦兼醫師。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302。

45 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美國外交官，傳教士出身。1833 年來華，在廣州爲美國公理會創辦印刷所。1856 年辭教會職，任美國駐華公使館頭等參贊兼翻譯。1862 年，衛氏攜眷到北京居住，從 1856-1876 年，二十年間曾七次代理館務。1877 年返美，任耶魯大學漢文教授。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513-514。

46 “The Asiatic Society,” Public Meeting, *N.-C. H.*, May. 18, 1872, vol. VIII, New Series, p. 393.

1873 年，中國參加維也納萬國博覽會，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委派稅務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與包臘(Edward Charles Bowra)承辦。赫德計劃從各口岸貿易商取得參展的樣品，可收花費省、貨物齊之效。同年，《北華捷報》中一篇文章討論中日參展之事，提到赫德的計畫，並進一步建議可一次準備三份樣品，除了送出國參展的一份外，一份放在進出口港埠成立商品館(museums of commodities)，另一份提供予總稅務司辦理北京展覽館(museum)。[47] 在這篇文章中，museum 與 exhibition 只有規模差異，沒有性質的不同，我們可能必須將前者譯爲工商展覽館；這些展覽館的內容與功能是雙重的，在各口岸從出口貨物中匯集而成的展覽館(museum)，可以形成中國參加國際萬國博覽會的基底，進口貨物展覽館則等於將外國的博覽會搬到中國來。關於後者，作者說上海一地就綽綽有餘了。進一步說，如果要在各通商口岸中選個地方辦進口貨物展覽館，則非上海莫屬。必須理解的是，這段談國際貿易的文字是由一個英國記者在英國商人摩肩接踵的上海寫的，但許多上海外商顯然也有相似的想法，這些想法未必僅侷限在上海西人間，1874 年的《申報》將格致書院稱爲與博覽會同義的格致院也就格外耐人尋味了。

1874 年 9 月 4 日，《申報》報導 8 月 31 日召開的第三次董事會，仍稱爲格致院，但這也是《申報》最後一次使用非格致書院的名稱。第三次董事會增加了一位重要的董事——前次董事會中傅蘭雅建議邀請加入的徐壽（雪村），此次由其子徐建寅（仲虎）代表與會。徐氏父子加入的意義在於江南製造局、上海道台與李鴻章逐漸被牽扯進來，對格致書院接下來的未來——尤其在募款方面——將有決定性的影響。綜合此次會議討論重點：一、原定資本額 2,500 兩尚不足 900 兩，但「已蒙徐君願以格致器相贈，且肯以他器借用，此外，又蒙傅蘭雅先生亦多備書籍，待院一開即可捐助」，因此眾董事皆贊成即行開院；二、向華人募捐之事，麥領事說：「業經向上海錢莊典當商賈店戶各等位人欲

[47] "The Far East and the Vienna Exhibition,"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Jan. 9, 1873, vol. XXVII, pp. 26-27。

捐銀而概未捐給」，因此「徐君已上稟蘇憲力請舉行此事，且請出示，將此舉之原意明晰詳述，仰各業湊銀相助」。[48]明顯地，上海的中國商人對此事興趣缺缺，認捐者寡，已籌集的 1,000 多兩可能大半來自英領事向西商募集所得。這個西資多於中資的狀況即將改變，但讓我們將注意力放在與博覽會有關的面向。

根據《北華捷報》對 1874 年 10 月 16 日書院董事會第四次會議的報導，董事會駐英國代辦 Bourne & Co.極力在英國報刊與企業界宣傳書院以及其目標，並自費印刷且寄發前述第二份章程。這份章程中提到，英倫商人或贈或借的「樣品、模型、機械與工具圖樣、科學儀器、工藝品、附插圖的書或照片等」在書院中將公開展示(publicly displayed)，並做最大程度的利用，這個說法其實相當模糊，因此傅蘭雅被要求擬出比第二份章程更詳細的規則。[49]由於展示牽涉到的是在英國的勸募，提出這個要求的顯然是董事會駐英代辦。新擬的（第三份）章程出現在 1875 年 1 月 8 日第五次董事會紀錄中，傅蘭雅一開始就申明書院的目的是以最實際的方式將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與製造展示在中國面前，仰賴的途徑有三："1st. An exhibition of machinery, apparatus, manufactured goods, &; 2nd. Lectures and classes; 3rd. Chinese Library and Reading Room"。[50]值得指出的有三點：首先是"exhibition"這個字正式出現，其次是它被擺在其他兩個更符合書院性質的事務之前，第三是在章程的六條說明中，關於展覽的第四條佔了全文一半。新的章程對展覽規則有更明確的說明，摘錄重點如下：

1. 物品借予書院者自負運送與運費，展出者一年內不得移除展出品。物品贈與書院者，自交付書院倫敦代辦起，所有費用由書院負擔。
2. 董事會在建築物空間允許的條件下，免費提供合理空間予每位展示者。展出一年後，如經費短缺，董事會得對出借之展出物品徵收固定費用。董事會謹慎維護受託物件，然展出物品如有遺失或毀損，

48 〈上海格致院董事敘議紀錄〉，《申報》，1874 年 9 月 4 日。

49 W. H. Medhurst, "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Minutes of Meeting & Prospectus... ," Public Meetings, *N.-C. H.*, Oct. 22, 1874, vol. XIII, New Series, p. 399。

50 W. H. Medhurst, "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Minutes of Meeting & Prospectus...,"Public Meetings, *N.-C. H.*, Jan. 21, 1875, vol. XIV, New Series, p. 54-55.

董事會概不負責。

3. 展出者姓名、地址、物品價格與解說文字將譯為中文附於物品前。書院編纂詳細中文目錄，並廣為流傳。送來展示品圖版者，免費置圖入目錄中。廣告將有合理收費。[51]

在贈送或出借物品給書院者之中，可能有一部份確是純粹的贊助，但商人與慈善家是兩回事，從研究博覽會的角度，我們比較在意「在商言商」的部份。出借者展出逾期收錢，打破不賠，如果再有功無賞實難以想像。事實上，既然展出品標價，目錄中還可以付費加廣告，對所有出借者與部份捐贈者而言，他對書院中辦展覽的理解必然是朝有商機的小型博覽會而去。幾個月後，《北華捷報》報導 1875 年 4 月 2 日第六次董事會議中，宣布倫敦的代辦升格成爲一個董事會，上海道台馮焌光不僅捐款，更應允展覽器物過海關免稅。[52]

在同年(1875)7 月 11 日舉行的第八次董事會議中，首先宣讀了駐倫敦代辦的信，信中敘述了展品的收集與運送，英國方面要求上海擬出更確定的規則給英國「參展者」，並要求指派一位外籍總辦來籌劃展覽。[53]對英國商人而言，如果真要辦博覽會，要求一名外籍總辦是很合理的事。博覽會千頭萬緒，中國人至今只有聽聞，零星參與，還未曾辦過一次。上海方面董事會開始卻步，最後決議擱置展覽之事，待書院發展至一定規模再說，但英國國內方面對展覽的

51 同前註，*N.-C. H.*, Jan. 21, 1875, p. 54-55。這份章程在《萬國公報》上出現兩次，第一次見〈上海格致書院發往各國之條陳〉，《萬國公報》，冊 1，頁 632-634，該卷抄錄同治 1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4 日《京報》。參考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頁 99-101，附錄一。第二次實際上是夾在傅蘭雅在第九次董事會報告中譯裡，見"The Polytechnic-Report," Public Meetings, *N.-C. H.*, Oct. 14, 1875, vol. XV, New Series, p. 378-381。中譯分兩期刊登，〈格致書院第一次紀錄〉，《萬國公報》，冊 3，頁 1558-1564，該卷抄錄光緒元年 8 月 11 日至 17 日《京報》；〈格致書院第一次紀錄續印〉，《萬國公報》，冊 3，頁 1591-1598，該卷抄錄光緒元年 8 月 18 日至 24 日《京報》。在續印一文中並刊載徐壽秉稿等件與捐助者名單與捐款數量。由於《萬國公報》主要讀者群是中國人，本文探討寄往國外章程在英國之反響與對在滬董事會的影響，因此採用《北華捷報》英文章程自譯。

52 "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N.-C. H.*, Apr. 8, 1875, vol. XIV, New Series, p. 336.

53 "Th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N.-C. H.*, July 31, 1875, vol. XV, New Series, p. 114; "The Polytechnic-Report," Public Meetings, *N.-C. H.*, 1875, vol. XV, New Series, p. 380.

熱度卻急速上升。到了這年 9 月 30 日的第九次董事會，展覽的事又被向前推了一步，英國國內的董事會規模擴大，成員增爲 8 名，這個董事會保證將努力促成書院的計畫，「尤其是有關展覽(exhibition)的部份」。除此以外，英國國內董事會並建議爲展覽另建展場，一座合用且華麗的大鐵屋的設計稿已寄達上海。[54]

三、妥協：修正與轉向

《北華捷報》對 1875 年 9 月 30 日書院董事會第九次會議的報導中，附加了一篇由傅蘭雅執筆的長篇報告，這篇報告一方面彙整歷次董事會決議與經過，另一個目的是糾正某些流傳於歐洲關於書院計畫的「荒謬誤解」(absurd misconceptions)。報告中說道：

> 一方面，這個小小的地區機構已經被誇大成一個「國際博覽會」與「水晶宮」，另一方面，展覽已經被扭曲成一種大眾娛樂與商品販售的雜貨店。[55]

這些「萬國博覽會」與「水晶宮」的謠言必然與英國國內建議興建的大鐵屋有關，但這些「謠言」並沒有等到 9 月底才在上海散播開來。《北華捷報》在 10 月 14 日刊登這個新聞，《申報》則更早在 9 月 23 日——書院第九次董事會的前一週——即已刊登一篇〈勸捐建博物館鐵屋說〉。根據這篇文章，估計外國廠商提供的物件約值 20 萬兩，既有展品，便需安放展品的所在，因此籌劃在書院旁建一長 200 尺、寬 50 尺、高 30 尺的大屋，需款 13,000 兩，「房屋之墻瓦均須以鐵爲之，窗戶均鑲以玻璃，始足以堅固而光明」，這座鐵屋明

54 "The Polytechnic-Report," Public Meetings, *N.-C. H.*, Oct. 14, 1875, vol. XV, New Series, p. 380。這 8 名董事分別爲：Sir Macdonald Stephenson, Major-General Sir James Alexander, Sir John Davis, George Turnbull, Esq., late Superintending Engineer of E. India Railway, C. St George Cleverly, Esq., late Survoyer-General, Hongkong, J. H. Lawrence, and J. R. Watts, Esq., Honorary Secretaries, John Bourne, Esq., Home Agent. 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兩人與東印度鐵路公司有關。此次會議未直接見諸報端，但出現在第九次董事會的報告中。

55 "While on the one hand this small local establishment has already been magnified into nothing less than 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nd "Crystal Palace", it has on the other hand been distorted into nothing better than a sort of bazaar or emporium for the general advertisement and sale of goods." "The Polytechnic-Report," Public Meetings, *N.-C. H.*, Oct. 14, 1875, vol. XV, New Series, p. 380.

顯指涉 1851 年倫敦博覽會的展覽會場（水晶宮）。[56]

在《北華捷報》刊登書院第九次董事會議紀錄與報告的同日，報上另有一篇文章討論這些流傳於歐洲關於書院的謠言，說道只要一點想像力將王錦堂的身分膨脹為中國高官，將代辦 John Bourne 哄抬為中國政府工程諮議，就足夠將書院章程擴大解釋為博覽會，作者繼續說道：

> 我們不知道不論這個混淆的狀況是出自個人的想望或記者的想像。但當我們看到用在報告中的"Exhibition"這個字以及章程的條文，都令人想到西方的博覽會時，我們就不忍苛責一開始在英國將「國際」兩字加上去、並給上海記上這筆功績的人，但我們恐怕無法寄望此事會有結果。[57]

《北華捷報》論說的作者是在上海的英國人，他顯然不認為在上海辦得出一個博覽會，但在上海卻有另一些與英國國內遙相呼應的中國人，在 1875 年 9 月重新熱切擁抱一年前「格致院」等於「博覽會」的概念。在前述《申報》9 月 23 日的報導中，不僅有「博物館鐵屋」的規模描述，更列出了計畫中展品的 10 項分類。這些資訊的詳細程度遠超過書院董事會提供給《北華捷報》的內容，這些分類規模龐大，卻從未出現在書院董事會的會議紀錄中，明顯地來自規劃大鐵屋的一群人，亦即書院的英國董事會。[58]對於建屋所需的 13,000 兩，《申報》主筆呼籲紳富捐輸，並直接點名胡光墉（雪巖）。[59]令人猜疑的是，有錢且急公好義只是贊助博物館興建的必要條件，東南富商不少，為何獨

56 〈勸捐建博物館鐵屋說〉，《申報》，1875 年 9 月 23 日。

57 "Whether the expansion is due to private inspiration or journalistic imagination, we are ignorant. But when we find the word "Exhibition" used in the report itself, and consignments of articles invited very much in the same terms as at Western "Exhibition", we are disposed to blame less severely the individual who first, in England, added the word "International", and credited Shanghai with an enterprise which we fear can hardly be hoped for as an early result." "The Polytechnic- Report," *N.-C. H.*, Oct. 14, 1875, vol. XV, New Series, pp. 372-373.

58 〈勸捐建博物館鐵屋說〉，《申報》，1875 年 9 月 23 日。計有：1. 動植物標本、2. 工藝之物或食物中生熟料、3. 織品、4. 建材與室內器具、5. 手中可持之器與各種機器、6. 工程機具、7. 做人物造像及各種繪畫之物、8. 兵器、9. 繪畫照相地圖等，與 10. 雜項。

59 〈勸捐建博物館鐵屋說〉，《申報》，1875 年 9 月 23 日。

鍾胡雪巖？我們或許可以從前一年(1874)《申報》報導 1876 年費城博覽會的文章中略窺端倪：

> 前歲奧國之開設博物賽院也，聞其曾託各國駐華使臣，令將中國土產制造各物送至該院爭賽，特未商之於恭親王耳，故中國朝廷未兼人往，僅有上海總稅務司西國赫君將中國土產制造各物，派令西國之人齎往鬥賽，中國之紳唯有杭州候選道胡雪巖方伯一人曾與其事，將家中所藏以及江浙所有各物，統交赫君帶往奧國而已，其他則無聞也。[60]

奧國的博物賽院指的是 1873 年維也納萬國博覽會，根據《申報》，中國商人送物參加博覽會的僅有胡光墉一人。1873 年《北華捷報》的即時報導也多次提到胡光墉參展的成績。[61]此事在翌年《申報》刊載的另一篇鼓勵參加費城博覽會的文章中，又被重提一次。[62]在《申報》主筆與投書者眼中，胡光墉與其他東南諸富商不同之處，在於只有他有參加國際博覽會的經驗，只有他和贈送或出借物品予格致書院博物館展覽的英國商人一樣，最有可能明瞭博覽會是怎麼回事。但這個特點只有在事情和博覽會有關時才會凸顯，亦即格致書院的博物館大鐵屋被當成如同博覽會的展覽場時。

在此，我們回顧格致書院建築的問題（圖二）。在 1875 年 4 月第六次董事會中，新任華董徐建寅建議書院應興建成中國式樣，以適應未來來訪書院中國高官的品味，內部則因應書院各種目的作適當的調整，至於展覽用的大鐵屋則無須太過講究；整個建築經費將不會太高，因為他已準備了建築藍圖，並且可以安排建造製造局房舍的本地包工負責工程。在 1875 年 4 月接替離滬的福勃士加入董事會的另一成員——亞洲文會新館建築師敬妥瑪——則提出競爭的意見，他也準備了一份包含所有徐建寅想法的藍圖，只要董事會同意他便可接手建築。徐建寅所說未來將來訪書院的中國高官，指的是以李鴻章為首的捐

60 〈論美國擬設格致院事〉，《申報》，1874 年 2 月 3 日。

61 胡光墉送展物品主要是絲織品與珐瑯器具，並得到中國獲得的四面進步獎(medal for progress)之一，見“China at the Vienna Exhibition,” *N.-C. H.*, Nov. 13, 1873, vol. XI, New Series, p. 413.

62 公桓氏，〈奉勸士商百工宜赴美國賽奇公會遊覽俾廣識見論〉，《申報》，1875 年 2 月 1 日。

款者，這些人在書院落成後當然有可能來看看捐的錢用到什麼地方去了。將建築蓋成中國樣式多少有些討好贊助者的意味，這點所有人都沒有異議，因爲內部配置將隨機能而定，外觀只是個殼。接下來，徐建寅接著採取激烈的態度與敬妥瑪競爭，說道購地之後所餘經費必然有限，他自願免費工作，也看不出爲何還要付錢請個外國建築師，最後，他反對任何董事會成員因爲書院服務而領取報酬。偉列亞力認爲最好僱用一個外國建築師負責此事，因爲權責相對，繁重的工作必須有個能負責的人；唐廷樞則認爲購地付 2.5%與建築的 4%佣金是合理的，也不致於對財務造成太大負擔。[63]最後，在徐建寅的力爭之下，會議決定擱置此事至麥華陀返滬再議。也就是說，若非如此，敬妥瑪、偉列亞力和唐廷樞的意見將會通過。在這次會議中，博覽會大鐵屋尚未進入正題。

敬妥瑪真正的意見在第八次董事會議紀錄中顯示出來：他反對未諮詢專業意見、莽撞進行建築，易言之，專業意見指的是他自己。董事會最後仍然決議以 2,960 兩委託徐建寅興建書院房舍，[64]理由未必是如果交由敬妥瑪承辦要花更多錢，[65]更可能的是因爲此刻中方捐資數量已遠超過洋商，徐氏父子的主導力越來越大。我們無須質疑徐建寅蓋中式房屋的能力，但如何期待他也能對付博覽會的大鐵屋？Joseph Paxton 在興建 1851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的展覽場之前，西方建築已在溫室、工廠、鐵橋等特殊的建築形態中累積了大量鑄鐵建材的經驗，再加上 Fox, Henderson & Co.建材鑄造的工業化產能，方始在極短的期限內完成展覽場水晶宮的建造。這些經驗既無法立即移植到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的提升更非一蹴可幾。[66]因此，徐建寅所能找到的中國包工不太可能有興建「水晶宮」的經驗與能力，再怎麼大躍進都沒有用。1877 年，《格致彙編》

63 "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N.-C. H.*, Apr. 8, 1875, vol. XIV, New Series, p.336.

64 "Th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N.-C. H.*, July 31, 1875, vol. XV, New Series, p.114。

65 "The Asiatic Society,"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Jan. 18, 1872, vol. VIII, New Series, p. 39；1869-1872 年間，敬妥瑪興建的亞洲文會新館——和格致書院規模相當——花了 2,700 兩。

66 Kenneth Frampton, *Modern Architecture 1851-1945*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3), pp. 4-12; Claude Mignot, *L'Architecture au XIX^e siècle* (Paris: Office du Livre, 1983), pp. 168-187.

報導書院大鐵屋（圖三），建築經費已漲到 14,000 餘兩，承造者爲「英國蒲恩公司」，亦即書院的英國董事會代辦 John Bourne & Co.，想來如果無利可圖，英國代辦也沒有理由如此熱心於書院事務。[67]在格致書院第十次董事會中，敬妥瑪明白反對接受英國董事會「免費」寄來的大鐵屋設計，他建議應將工程交予上海當地「稱職」——亦即如同他自己——的建築師，如此則經費可大幅縮減。[68]

但在 1875 至 1876 年間，更大的問題是錢。至書院開幕前董事會總共募集了約 8,500 兩，其中 4,500 兩購地，2,960 兩用在書院主建物的興建上，[69]相較之下，大鐵屋的 1 萬 3、4 千兩真是天大的數字。1875 年底，隨著書院籌設愈見成形，董事會發覺博物館（或博覽會）一事越發尾大不掉，態度也越來越退縮。1876 年 2 月的第九次董事會議中，雖然徐壽提及他和他的中國友人皆熱切期盼博物館大鐵屋興建起來，董事會最後決議：由於此一計畫的財務與其他相關安排都由徐壽掌理，董事會最好將此事當作書院的旁枝事務，並將其基金與帳目完全與書院分開。[70]董事會完全無意辦一個不能真正稱爲博覽會或土法煉鋼式的「博覽會」，將博物館大鐵屋與書院的基金分離，等於請仍無法忘情於此者自行設法，董事會的西人自此袖手，不再於此有任何積極作爲。1876 年 6 月 22 日，格致書院開幕，領事麥華陀在致詞時仍提到徐雪村父子對博物館大鐵屋念念不忘。[71]格致書院這座或可比擬水晶宮的大鐵屋終究命運乖舛。[72]

格致書院開幕前三個月，1876 年 3 月 24 日，格致書院董事會在尚待裝潢

---

67 〈上海格致書院擬設鐵嵌玻璃房屋爲博物館圖說〉，《格致彙編》（南京：古舊書店影印本，1992），第 2 年，1877 年 2 月（光緒 3 年正月），頁 318-320（原頁 6-7）。

68 "Th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N.-C. H.*, Feb. 17,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 143。敬妥瑪在 1876 年底辭去書院董事職，"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N.-C. H.*, Dec. 28, 1876, vol. XVII, New Series, p. 629。

69 綜合格致書院各次董事會紀錄所得。

70 "Th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N.-C. H.*, Feb. 17,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 143.

71 "Opening of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N.-C. H.*, June 24,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p. 617-618.

72 〈上海格致書院擬設鐵嵌玻璃房屋爲博物館圖說〉，《格致彙編》，第 2 年，1877 年 2 月（光緒 3 年正月），頁 319。文中稱：「所擬造博物館房屋之正面略如第七圖式」（底線筆者所加），所附的鐵屋圖應與格致書院大鐵屋無關，一因爲比例不符 50 與 30 尺（《申報》）、或 50 與 40 尺（《格致彙編》）的寬高比，二因爲此圖中鐵屋形式較像市場、火車站而非博覽會展覽場。

粉刷、但已大致完工的新書院中開會，李鴻章手書的匾額與對聯也已掛上。但博覽會縮減成的展覽呢？最熱心於博覽會的徐壽準備了 12 個大櫃子，董事會看過後認爲只能用來放置圖書館的中國書籍，不適合用來展示昂貴的科學儀器、模型及樣品。因此決定委託徐壽再訂製 8 個有玻璃門、可上鎖的大櫃子。董事會秘書傅蘭雅接著介紹預計取得的科學器具，計有：電氣製造者(J. D. Bishop)[73]透過麥華陀允諾捐贈一套電學器材、老德記藥房(Llewellyn & Co.)捐贈一套化學器材、隆茂洋行(Mackenzie & Co.)捐贈氣壓計、[74]Dr. Little[75]捐贈一對地球儀、徐壽則願意出借個人收藏儀器的一部份。至於曾經去信聯絡的外國製造商行，竟無人回應。[76]看來預計可以到手的器具是決計裝不滿 8 個大櫃子。

1876 年 6 月 22 日，書院開幕當天，賓客進到大廳中看到的展出品可用稀疏兩字形容。除了上海當地洋商捐贈或出借的物品外，來自英國雪菲爾(Sheffield)的 Turton & Mathew's Brothers 公司展出 Phoenix Steel Works 製造的 1 箱鋼鐵產品、Redditch 的 Bartlett & Sons 公司展出鋼針與魚鉤、Westminster 的 Siemens Brothers 公司透過駐上海代表出借 1 套電報器具，加上前述上海當地洋行認捐或借出的一些儀器；[77]斯諦文森(Sir Macdonald Stephenson)寄來一份報告——「關於將火車引進中國的可行性與最實際的方法」("Report upon the feasibility and most effectual means of introducing railways in the Empire of China")，報告附一張大地圖，「在中華與相近之國內指出便於開鐵路之各處」，[78]此外還有一個火車頭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斯諦文森於 1845 年起任東印度鐵路公司(East Indian Railway Company)第一任總經理，其實便是此刻格致書院

73 見 *The China Directory for 1874*, p. J15。

74 關於 Llewellyn & Co.與各 Mackenzie & Co.中文名稱，見黃光域編著，《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 248、643。

75 Dr. Little 可能爲立德祿(Robert William Little, 1840-1906)。英國人，1866 年來華經商，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字林西報》主筆。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289-290。

76 "Th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Public Meetings, *N.-C. H.*, Apr. 6,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p. 321-322.

77 "Opening of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N.-C. H.*, June 24,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 617.

78 〈上海格致書院〉，《格致彙編》，第一年，1876 年 7 月（光緒 2 年 6 月），卷 6，頁 150-151（原頁 11-12）。

英國國內董事會主席。這令人不禁以爲英國方面真正的興趣是把鐵路自印度延伸進中國來，尤其是淞滬鐵路的興建與拆除正是在這段時間中發生的。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事情是，相對於英國廠商的冷淡，比利時廠商提供了大量照片：列日(Liège)附近，Cockerell & Co.之 Seraing ironworks 展出鑽礦用空氣壓縮機的照片、Charleroi 的 Marcinelle & Couillet Co.展出火車頭照片、Marchiennau Pont 的 Pâris-Issac 提供鐵屋與鑄鐵柵欄的圖片、布魯塞爾的 Verhaeven & De Jacger 展出火車頭與車廂圖、列日的 Dumouline 展出兵器目錄。[79]即使加上這些圖片，這個沒有水晶宮的展覽實在談不上豐富。對於展出物品的貧乏，麥華陀解釋因爲中日關係緊張，英國商人不肯涉險運貨前來，這其實是一個相當尷尬的理由。牡丹社事件早在 1874 年底即已落幕，當時格致書院董事會才剛開始積極籌劃展覽的事。

四、掙扎：起死回生的努力

1876 年底，格致書院董事會人事發生重大變革。王錦堂前往福州任新職，敬妥瑪辭去董事身分，[80]徐建寅則更早在 1875 年已由山東巡撫丁寶楨任命爲山東機器局總辦。[81]麥華陀即將退休返英，董事會選出時在江海關稅務司的吉羅福(G. B. Glover)爲主席，另外新增任職英國駐滬領事館的 W. H. Tapp 接替麥華陀原擔任的財務與出納工作。[82]江海關稅務司經常負責中國參加國際博覽會貨物採辦事宜，這樣一個新的主席人選沒有任何隱藏的想法嗎？除了人事更

79 〈上海格致書院〉，《格致彙編》，第一年，1876 年 7 月（光緒 2 年 6 月），卷 6，頁 150-151（原頁 11-12）。。

80 Th. Kingsmill 於 1877 年初至 1880 年 3 月任亞洲文會主席。"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ublic Meetings, *N.-C. H.*, Mars 11, 1880, vol. XXIV, New Series, pp. 218-220.

81 見格致書院開幕式麥華陀致詞，"Opening of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N.-C. H.*, June 24,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 617.

82 William Handyside Tapp 出現在 1880 年《北華捷報》上一篇事故鑑定報告中，職銜爲 Register of Shipping for China and Japan；"More about the Star Queen," Correspondence, *N.-C. H.*, July 20, 1880, vol. XXV, New Series, p. 58. 另見 *The China Directory for 1874*, p. 91。

動外，董事會必須面對甫開幕六個月便已累積高達 1,000 兩的赤字。董事會詢問徐壽關於興建大鐵屋之事，徐答以李鴻章已指派胡光墉承辦。董事會接著談到委託將回國的麥華陀就地聯繫英國國內董事會，而除了麥華陀外，原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與新任中國駐英欽差大臣的郭嵩燾也都是可能協助格致書院的人選。[83]據會議紀錄稱，郭嵩燾在 1876 年底出國前夕，在上海道台馮焌光陪同下參觀了格致書院，大加讚賞。赴英使節團的副使劉錫鴻也在同時參觀了格致書院，卻輕蔑有加。在後者的觀感中，「格致」兩字的意涵宏大高遠，格致書院之名簡直是對這個詞的侮辱，劉錫鴻說：「易格致書院之名，而名之曰藝林堂，聚工匠巧者而督課之，使之精求製造以聽役於官，猶百工居肆然者，是則於義爲當。」[84]

1877 年 2 月 23 日，格致書院召開董事會，洋董又增加一位 Charles de Boleslawski，所有中國董事或因病、或因天氣不好、或不在上海，全部缺席。秘書傅蘭雅原應在董事會中提出 1876 年度報告，但因爲無法提供上年度收支明細而擱置。出納 Tapp 接著抱怨道：還未經查核的都是徐壽經手收取與支出的帳目，尤其這些帳目全都是以他看不懂的中文寫的；雖有傅蘭雅與偉列亞力允諾幫忙看帳本，Tapp 要求爾後書院經費全部由出納一人經手，董事會決議將這個意見反應給徐壽。但之後傅蘭雅爲這個狀況提出說明：徐壽另有要事纏身，將盡快處理此事；另一方面，書院基金有百分之八十——亦即中方捐款、以及同樣比例的每人每年 6 元會員年費，都是直接由徐壽經手。[85]這事實上暴露了書院經費籌措與管理的問題：董事會中有兩個管錢的。之前最大的開銷是買地和建屋，由於大部份經費來自中方，這些事顯然都由徐壽直接處理，並未再上報董事會出納。麥華陀擔任董事會主席兼出納時相安無事，但新的出納顯然十分不習慣中國人的做事方式。我們不禁要想：董事會是否仍然要冒著中方

83 "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Public Meetings, *N.-C. H.*, Dec. 28, 1876, vol. XVII, New Series, pp. 628-629.

84 劉錫鴻，《英軺私記》（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 1 輯（七）；長沙：岳麓出版社，1986），卷 5，頁 50-51。

85 "The Polytechnic," Public Meetings, *N.-C. H.*, Mar. 15, 1877, vol. XVIII, New Series, p. 268.

捐款斷絕的危險，要求徐壽不再管籌措經費的事？如果因循舊規，出納 Tapp 要如何在夾縫中做事？

傅蘭雅接著報告有關展覽事：展覽定位為工業展(Industrial Exhibition)，而由李鴻章指派的胡光墉已經答允個人先捐 3,000 銀元。Boleslawski 則說明他已經將書院展覽的事書寄歐洲，並廣泛刊登於各報上，但迄今無任何機器或物品的捐贈回應。他認為，除非有立即的售貨可能，他不相信歐洲的製造商願意寄任何樣品或機具來。這大概是自書院籌設以來對「博覽會」最冷靜現實的評估了。傅蘭雅報告道他寫信給在英國的漢璧理(Thomas Hanbury)，希望他提供價值 500 兩的科學器具充實讀書室，迄無回音；這個關係可能來自於漢璧理甫捐款給亞洲文會。[86]大會接著宣讀了麥華陀由香港寄來的信。麥華陀在參觀過香港（自然）博物館後，建議書院或許可以增設這方面的收藏，尤其上海博物館因為日益增加的藏品已覺狹隘，多餘的藏品或許可以轉到書院來。Tapp 附和這個想法，並說將和上海博物館館長聯繫。[87]

上海博物館(Shanghai Museum)源自亞洲文會成員的標本收集活動，在 1872 年初亞洲文會遷入新館時，亞洲文會即已在新館二樓預留了博物館空間。1874 年 4 月，博物館籌備委員會成立，成員多為亞洲文會會員。[88]同年 12 月初再開會，麥華陀擔任主席，秘書則為普萊亞(W. B. Pryer)，後者將在博物館未來的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89]1875 年 1 月，博物館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會中討論博物館當時的照明，因此博物館各項設施應已就位。[90]綜合幾次會議所見，博物館藏品至少分為數部，包括工業與製造產品部、鳥類部、魚類部、海洋無脊椎動物部等，十分多樣。《申報》在 1875 年底報導此一博物院，

86 漢璧理(Thomas Hanbury, 1832-1907)，英國商人，1853 年來華，1865 年當選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熱心贊助公共事務，包括學校、醫院等。"N.-C. Bra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ublic Meetings, *N.-C. H.*, Jan. 25, 1877, vol. XVIII, New Series, p. 85.

87 "The Polytechnic," Public Meetings, *N.-C. H.*, Mar. 15, 1877, vol. XVIII, New Series, p. 269.

88 "A Museum for Shanghai," Public Meetings, *N.-C. H.*, Apr. 18, 1874, vol. XII, New Series, pp. 334-335.

89 "The Shanghai Museum," Public Meetings, *N.-C. H.*, Dec. 17, 1874, vol. XIII, New Series, pp. 596。普萊亞(W. B. Pryer)應即 1872 年和美查(E. Major)共同創立《申報》的另三人之一。

90 "Shanghai Museum," Public Meetings, *N.-C. H.*, Feb. 18, 1875, vol. XIV, New Series, p. 148.

並說明：「其總理斯事者即元芳洋行朴來阿君……此院設在圓明園路洋文書院樓上」（圖四）。[91]1876 年 5 月，博物館在《北華捷報》上登載勸募信；根據其說明，自 1874 年 8 月至 1875 年 10 月，上海運動事業基金(Recreation Fund)陸續撥款 1,500 兩作為博物館運作經費，但在支付標本剝製費、向圖書館繳納場地租金、印刷目錄等雜費後，赤字已經達 200 多兩；一年多來藏品暴增，計已有 50 餘副哺乳類動物標本、3,050 隻鳥類標本，還有大量的蛇類、昆蟲、貝殼與植物標本。[92]這篇文字中沒有提到有什麼「工業與製造產品部」的藏品，事實上，上海博物館至此的聲譽已經建立在動植物標本收藏上，性質上是一個自然博物館。這樣一個博物館明顯與格致書院的工業製造展覽大相逕庭，但書院董事會面對缺乏展品的狀況，已經顧不得這個差異了。

1876 年書院開幕時的展覽中，比利時商人展現了相當大的興趣。1877 年 6 月，比利時國王透過駐華公使 E. Serruys 捐 500 元墨西哥鷹洋給書院。為了表示對比利時國王的尊重，這筆錢並未被用於應付書院左支右絀的日常開銷，而是要求捐贈者由比利時代購等值的書院科學講座所需儀器。按常理設想，由國王交辦購買本國儀器作為饋贈他國禮物，既不可能缺乏誠意地以不值 500 銀元的物品充數，也不太可能有人跟國王哄抬價錢，這批儀器後來成為書院中重要的財產。傅蘭雅並在回信中希望比利時在裝船運往中國之前，在某個博覽會中展出，以收為書院宣傳之效。[93]

1877 年初郭嵩燾抵英，書院的英國董事會把握機會與郭接觸。2 月 24 日，斯諦文森致函郭嵩燾，大力向中國推銷火車。[94]數日後，郭嵩燾在幾位前駐中國的公使、領事陪同下參觀倫敦的格物局——Polytechnic Institution：

光緒 3 年(1877)2 月 28(西曆 4 月 11)日——麥華陀先約赴波里得克尼克

91 〈創設博物院〉，《申報》，1875 年 11 月 4 日。

92 "The Shanghai Museum," Public Meetings, *N.-C. H.*, May 6,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 436.

93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and Reading Room," Miscellaneous, *N.-C. H.*, June 30, 1877, vol. XVIII, New Series, pp. 651-652.

94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 1 輯（四）；長沙：岳麓出版社，1984），卷 5，頁 155。

> 英斯諦土申(Polytechnic Institution)觀機器，猶言格物局也。……其專函來約者，約翰盤也……此次格物局願捐機器充入上海格致書院，亦由盤一人勸合之力。所約麥華陀及阿爾科克、威妥瑪、巴爾第爾，專以其久居中國，約來一陪。阿君前充中國公使，巴君則始通商時充上海領事者也。斯諦文森亦至，皆素識者。[95]

郭文所稱的「約翰盤」應即書院英國代辦 John Bourne，且 Bourne 似乎爲倫敦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成員，這解釋了爲何格致書院定名爲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後，聘請 Bourne 爲駐英代辦。郭後文中亦提及捐贈格致書院的機器：

> 是日閱機器三具、光鏡一具。……光鏡及機器三具皆允送入上海格致書院。[96]

英國董事會接著採取更積極的態度來推動格致書院的博覽會。郭嵩燾在日記中說道：

> 光緒 3 年(1877)4 月 28(西曆 6 月 9)日——為上海設立博物院，詣盤與商。盤言一千八百五十一年阿洛伯(Prince Albert)獻議開設賽奇會，集萬國人民器物，設玻璃院海德巴園(Hyde Park)，以六閱月為期。於是各國珍奇畢至，房稅已多。而所造玻璃屋，英人聚資購之，就城外隙地建置游觀之所，即今水晶宮是也，國家獲利甚厚。嗣是奧大利、美利堅相踵為之。明年法國復開此會。上海博物院略仿其意，不獨有益中國學問，即國家亦必稍有所利。[97]

「上海博物院」指格致書院的博覽會。從文字看來，郭嵩燾主動拜訪 Bourne，顯示他對這個計畫持肯定的態度。英國董事會繼續推出更具體的計畫：

> 光緒 3 年(1877)9 月 28(西曆 11 月 11)日——斯諦文生、密斯盤來見，以合淝伯相命徐雪村、傅蘭雅會議上海博物院辦法，意欲於此開立學館。

95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卷 5，頁 156-157。
96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卷 5，頁 157。
97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卷 7，頁 220-221。

> 傅蘭雅以告密斯盤，因會同斯詠文生來言：「如此則中國自行購辦一切，英國、阿薩密不得與聞。」乃復議從小開一局面，以二萬磅為限，由中國購造。或多或少，依照增減，由英人承辦，即以二萬磅承息六厘。所有陳設機器各自運往，中國一切不問。並約擬一章程見示。[98]

英國董事會將這個計畫通知上海，經過與書院董事會議紀錄比對後，其內容爲：中國政府提供 2 萬英鎊借款的擔保，以 7%計息（郭文中爲 6 厘），以這筆錢倫敦董事會成立公司、興造房屋並提供展品，門票收入充作公司紅利。[99]2 萬英磅約合 7 萬兩，這已經比 1875 年 9 月 23 日《申報》中所說的「外國廠商提供約值二十萬兩的物件」的規模小了許多，但畢竟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博覽會。這 2 萬英鎊是由英國董事會出面借貸，中國政府提供擔保，誰來還錢？沒有人講，但可確定的是如果公司還不出錢，擔保人就得「擔保」；「英國、阿薩密不得與聞」的條件，應是聲明英國官方與東印度（鐵路）公司不插手以避嫌。建造博覽會館舍一事，推測應在英國鑄造模組零件，運到上海組裝。英國董事會可能真的認爲上海博覽會的門票收入可以讓收支保持平衡，甚至獲利。

另一方面，根據書院董事會議紀錄，郭嵩燾不是上報總理衙門，而是將這個計畫轉告李鴻章。李鴻章寄信徐壽，告訴他由於格致書院不是政府的事，不能指望中國政府擔保。[100]這是 1878 年 2 月時的狀況。事實上，我們很難相信中國政府願意投入 7 萬兩在這個郭嵩燾稱國家僅能「稍有所利」的事業。對上海舉辦博覽會的反對意見可以一同出使英國的副使劉錫鴻爲代表；郭嵩燾在 1878 年批評劉錫鴻「於上海博物院指斥尤力，謂導使洋人操持中國利權。其心必不欲使中國窺見西洋好處，甚是怪奇」。[101]回溯書院籌設之初，中方捐款的湧入始自李鴻章，如今失掉李鴻章的支持，至少在書院中辦博覽會一事，一切中方贊助隨之停止。

---

98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卷 12，頁 348-349。

99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Public Meetings, *N.-C. H.*, Feb. 21, 1878, vol. XX, New Series, p. 187.

100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Public Meetings, *N.-C. H.*, Feb. 21, 1878, vol. XX, New Series, p. 187.

101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卷 23，頁 737。

五、束手：埋葬博覽會計畫

在英國方面的努力觸礁之前，格致書院人事更迭。1878 年 2 月，吉羅福即將離滬赴歐，建議已洽談多次的擔文(W. V. Drummond)為接任主席人選。[102] 擔文的本業是律師，吉羅福的建議或許湊巧，但書院接下來的董事會立即面對的便是一件法律案件。Boleslawski 建議邀請吉羅福在江海關的繼任者加入，董事會感謝吉羅福自麥華陀離去後的服務，並希望他繼續在歐洲與美國促進書院的利益；此刻，以 1877 年 6 月比利時國王捐贈的 500 銀元購買的器具即將抵達，董事們也建議邀請比利時公使 E. Serruys 成為董事會會員；秘書傅蘭雅原應將年度報告提交董事會，但是和前一年一樣，沒有徐壽的帳目，這些事都被迫延後。傅蘭雅並透露一件事：徐壽在每年 6 元會費的收據上聲明三年後將不用再繳會費，但這是徐壽自己的主張，並未經過董事會的決議。唐茂植（唐廷樞弟）說他將與徐壽商討此事。但 Tapp 顯然已經受不了繼續這樣夾纏不清，辭去出納職務。[103]

1878 年 4 月 6 日，擔文接任董事會主席並召開會議，原因主要是徐壽提出一份財務建議書。在這次會議中，秘書傅蘭雅總算能提交上年度工作報告與帳目，亦即徐壽合作了。未出席的徐壽不只是合作而已，他以十分強勢、用 5,000 兩捐款撐腰的建議書「進攻」董事會，他聲明建議書代表了曾經捐款的中方官紳意見，因此「相信」董事會將會有正面回應，這擺明了告訴洋董事們：沒出錢的不要意見多。徐壽在建議書說明，一位中國仕紳答應捐贈 5,000 銀元興建博覽會，徐建議在捐贈者同意下轉移用途在購買科學儀器、清理赤字等；徐壽進一步要求將書院地契按中國習俗封存在一座石碑之中，且若無董事會全

[102] 〈經理書院易人〉，《申報》，1878 年 2 月 23 日。律師擔文 William Venn Drummond，曾於 1879 年任郭嵩燾控告《申報》美查毀謗案律師，見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卷 30，光緒 5 年 3 月 9 日，頁 974。另見陳同，〈略論近代上海外籍律師的法律活動及影響〉，《史林》，2005 年第 3 期，網路文件www.historyshanghai.com/admin/WebEdit/Uploadile/0530T.pdf，頁 11-14。

[103]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Public Meetings, *N.-C. H.*, Feb. 21, 1878, vol. XX, New Series, p. 187.

體成員同意不得移除。立碑之事達成協議(understanding)後，協議書將分別送英國領事館與道台衙門存檔。[104]《申報》對此事的報導如下：

> 滬上格致書院前於本月初二日中西董事會集於院……公議曰：本書院為講論格致之公所，在院董事難免更換，所有基地之契據更番收管恐致疏虞，茲議公同錮藏碑首，以垂久遠，倘有要事取觀，必須公同開閱，事畢仍舊錮藏，不得一人私取，或有取出向人抵押銀錢，其契即作廢紙。[105]

徐壽交董事會的建議書中說，如果董事會同意上述處理方式，則他願意追加 1,000 兩。徐壽沒有說如果董事會不同意的話怎麼辦？他就不捐了嗎？已經收到的捐款 5,000 銀元呢？爲何徐壽對藏契據於石碑中如此慎重堅持？錮藏地契於石碑中的作法多少令人困惑，這樣比較能保存文件嗎？事實上，1876 年底書院董事會議時已出現約 1,000 兩的赤字，在沒有新收入的狀況下，這個赤字是以評估約值 8,000 兩的書院房地產作抵押，向匯豐銀行借貸來弭平的，亦即書院地產契據押在銀行。向銀行貸款仍是欠債，這筆赤字隨著利息不斷累積。以格致書院此刻除了會員年費外毫無其他生財之道的運作方式，這個財務狀況只會不斷惡化。另一方面，格致書院迄今所有大筆錢的出入都是經過徐壽之手。如果公私分際不明，欠匯豐銀行的是格致書院還是徐壽？[106]徐壽可以對房地產抵押一事置之不理，一直累積債務到銀行查封拍賣書院嗎？不可能，因爲他必須對以李鴻章爲首的一批中方贊助者交代。這些人當初把錢交給他，不是交給書院董事會。憑著到手的 5,000 銀元，徐壽準備變更這筆款項用途，清償債務，取回契據，並斷絕日後再以契據舉債的可能。此事必須先逼迫董事會就範，工具就是扼住負債的書院所亟需的錢。

---

[104]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Public Meetings, *N.-C. H.*, April 20, 1878, vol. XX, New Series, p. 403。徐壽建議書英譯列爲附件。

[105] 〈紀本月格致書院中西紳董會議藏契事〉，《申報》，1878 年 5 月 16 日。此會議未見《北華捷報》登載。

[106] Biggerstaff 說，在 1870 年代末期，書院越來越像徐壽的私人宅邸。見 Biggerstaff，前引文，頁 80。

看在錢的份上，徐壽的「建議」不太可能遭遇阻力。在建議書中的收入部份，獲捐的 5,000 銀元合 3,700 兩，該款利息 300 兩，徐壽本人再捐 1,000 兩，湊成 5,000 兩。在支出部份，興建展覽會前廳(vestibule for Exhibition)422.65 兩，還匯豐銀行借款並利息 1,355.75 兩，欠出納 273.75 兩，買科學儀器材料等 2,000 兩，興建出租中式房屋等 947.85 兩，一共「正好」5,000 兩，一厘不剩，如同宣稱募款者有使用支配權一般。我們從後來的董事會議紀錄中得知，5,000 銀元捐款的金主是胡光墉；[107]1877 年 2 月董事會議的消息是胡光墉捐 3,000 銀元，現已增加到 5,000 銀元。我們的第一個疑問是：3,700 兩（5,000 銀元）得放在錢莊多久才生得出 300 兩的利息？其間董事會對這筆錢的下落毫不知情。此外，展覽會的前廳是怎樣的建築？它的興建經費比原計畫博覽會大鐵屋的 1 萬 3、4 千兩萎縮多了。

徐壽透過傅蘭雅提出第二個建議：書院地不規則，南邊比北邊多 40 呎，故建議切割三角畸零地使基地方正對稱，並將畸零地出售。引人納悶的是：就爲了這種「肉不正不食」的理由賣地？不是才說要把書院契據錮藏石碑中，不得隨意典押嗎？不能典押，反倒可以賣？姑不論前後建議有何扞格，徐壽說，有一位中國仕紳預備以原價購買此地興建學校，買主是現成的。此事果真湊巧，湊巧到令人無法不相信這是先斬後奏，但書院洋董們豈敢說聲不，只有 Tapp 建議賣地的錢應加入徐壽在第一份建議書中計劃在北緣興建一排房屋的經費中，把北緣（書院後方）蓋滿。在第一份建議書的支出部份，董事們認爲在科學器材上花 2,000 兩太多，主席也認爲不應將錢花在購買昂貴器材上，而應用這筆錢自歐洲聘請教師——尤其的是化學和礦物學教師——到院授課，這將會使得書院更有活力。但由於徐壽如此慷慨地清理書院赤字，董事會純粹「只

107 胡光墉除參加 1873 年維也納萬國博覽會外，繼續參加了 1876 年費城萬國博覽會。李圭，《環遊地球新錄》，卷 1，〈美會紀略〉。本文以期刊傳播較單書出版爲廣之故，採用《萬國公報》連載節錄版：〈各物總院〉，《萬國公報》，冊 9，頁 5446，當期錄〈左列武林胡觀察景泰窯器〉，《京報》，光緒 4 年(1878)7 月 18 至 27 日；另見“China at the Centennial,” Miscellaneous, *N.-C. H.*, Feb. 17,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p. 146-147。根據《北華捷報》，胡光墉送展的景泰藍與銅器值 3 萬兩，幾佔所有送展中國物品總值（10 萬兩）的三分之一。

是建議」而已。

從一件事可以看出董事會的財務拮据到何種程度。在這次董事會中，大部份董事決定不再續保火險，可以想見的原因是，在負債千餘兩的財務條件下，保險已是無法支付的開銷。與會的 Serruys 認爲不保險是不明智的，尤其比利時國王捐贈的整套科學器材已運進書院。以上海火災之頻繁，像格致書院這樣的木造房屋保火險是所在必行之事。但保險的事沒有進一步討論。奇特的是，沒有任何一位董事想到從徐壽的 5,000 兩中分杯羹出來保火險，或許是沒人敢這麼想。

除了討論徐壽的建議書外，董事會中也有新的人事變化，Serruys 即將返比，Boleslawski 希望邀請下一任比利時公使加入書院董事會。傅蘭雅寫信給江海關吉羅福的繼任者 F. E. Wright，邀請其加入董事會。傅蘭雅本人即將離滬赴英，其間由夏士(J. Haas)代理秘書職。[108]

在這次董事會中，董事們檢視 Bourne & Co.贈送的一套光學器具(optical apparatus)，這套器具應是郭嵩燾在倫敦所見、Polytechnic Institution 將贈送書院之物；根據郭氏文中的描述，這應是一具幻燈機。[109]除此以外，Bourne 還贈送了一套陶瓷燒製的裝飾物品，作爲展覽(Exhibition)的準備。這些顯然還是在書院的英國董事會極力推動博覽會新計畫之際所送。董事會要求秘書寫信給國內董事會，不用再期望中國政府提供 2 萬磅擔保用來興辦博覽會，但如果國內董事會可以自己募集到錢，上海董事會將極力協助成事，[110]這當然只是口惠。

光緒 5 年(1879)3 月，郭嵩燾已返國，在上海參觀了格致書院，「偕姚彥嘉、張聽帆至格致書院，約林樂知會談。所藏各種小機器亦數百事，法國瓷器

108 夏士(Ritter von Joseph Haas, 1847-1896)，爲此時奧匈帝國駐滬副領事，同時也是亞洲文會秘書。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185。

109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卷 5，頁 157，「其用影鏡照山水人物凡二處，亦戲具也」。戲具指的是「影戲」之具。

110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Public Meetings, *N.-C. H.*, April 20, 1878, vol. XX, New Series, pp. 402-403。徐壽建議書英譯列爲附件。

及鳥獸蟲介亦頗有之。其間化學機器，多比利時國主捐置。」[111]數百件小機器包括什麼不得其詳，法國瓷器來自 Bourne & Co.，鳥獸蟲介標本來自上海自然博物館，比利時國主捐置的化學機器來自 1877 年 500 銀元捐款，這就是 1879 年初整個格致書院博覽會的規模。

從 1878 年 4 月之後整整兩年時間，格致書院的董事會完全停擺，連每年初的年度大會都不見了，自然也談不上年度報告與帳目。1880 年 5 月，董事會再度開會，主席不變，傅蘭雅返國仍任秘書，而徐壽成爲新的出納。[112]徐壽在會中首先提出過去一年十個月的財務報告；在收入部份，如前次董事會建議書，胡光墉的捐款、利息與徐壽捐款共計 5,000 兩，此外在 1878 年出租 10 間房屋（下）半年，帶來 52.925 兩的收入，1879 年同一批房屋租金 118.63 兩，共計 5,171.555 兩；在支出部份，1878 年還銀行貸款 1,135.75 兩、建展覽會前廳 422.65 兩、建 10 間屋 417.75 兩、購買化學器材 26 兩、科學器材 932.5 兩、購傢具等 6.375 兩、稅金與日用支出等 137.365 兩，1879 年買科學器材 519.620 兩、修理費等 133.71 兩、購傢具 42.78 兩、日用支出 113.48 兩，結餘 1,063.675 兩。從帳目來看，原來董事會同意的畸零地出售並未執行，至少帳目中沒有賣地的收入；10 間房屋花了一兩個月就已經蓋好出租了；捐款在 1878 年即已入帳，銀行貸款也當時便還掉了——這兩筆錢的利息和 1878 年 4 月時的建議書中一樣。貸款既清，書院契據到手，但到此次董事會之前，徐壽還未準備好石碑的碑文，契據自然尙未「錮藏」。

董事會議紀錄中提到，書院的科學器材、圖表、書籍等至今已足所需，華蘅芳在過去一年已經義務擔任書院的駐院經理(resident curator)，導覽參觀者，是在中國報紙上刊登廣告招徠更多參觀者，接納所有體面的中國人的時候了。這段話看來是徐壽講的，因爲除了徐壽外，還有誰能讓華蘅芳住進書院當經理？至於登報廣告一事，實際上在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六個月前，啓事已經登上

111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卷 30，頁 980。
112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Public Meetings, *N.-C. H.*, May 25, 1880, vol. XXIV, New Series, p. 458.

《申報》了。[113]除了徐壽，又有誰膽敢在未經董事會決議下刊登招生啓事？

除了 1878 年計畫書中所提到的一些建築計畫，徐壽另外在書院南面興建了一些中式房屋，每月可以有 15 兩的租金收入，董事會同意了；這些屋子可能剛完工，因爲 15 兩的收入尙未列入年度收入中，但既然已經建好，董事會除非拆房子，只有追認一途。此外，有人——顯然仍是徐壽——提議用現有千餘兩盈餘，在目前看來不會用到的土地蓋更多這樣的房子以增加收入，董事會依舊同意了；徐壽並已寫信給天津官員友人募款，以完成如教室、學生宿舍等建築；他繼續提到一位中國仕紳 Tai（戴？）在書院鄰接地上興建中式大屋，將用作自己或其他中國友人至書院研究時居住之用，且預備贈送給書院。屋子的棟樑完成，其他建材運抵後，戴離滬；徐與之聯絡，戴將未完成的房屋與建材一併贈送給書院。會議紀錄中沒有說明對方送了房子，土地呢？如果房子連土地一起贈送，爲何徐壽的年度帳目中沒有入帳？這座房子是否興建在 1878 年計劃分割出售的三角畸零地上？如果土地未出售？又是誰允許戴（？）姓仕紳在書院的土地上興建房屋。關於格致書院的建屋工程，《申報》在 1879 年底報導：

> 本埠格致書院前議招致生徒，業已入報。茲聞書院後之空地將全行蓋造樓房，為將來安置生徒及停頓各考據器物之所。現已木石山積，不日即須開工也。[114]

《申報》上所說的工程不可能是書院北緣的 10 間房屋，因爲這批房屋在 1878 年已經開始出租；這個工程不可能是展覽場的「前廳」，因爲工程款已在 1878 年付清；這個工程也不可能是徐壽在書院南面所建的房屋，因爲月租 15 兩的房屋建材不可能「木石山積」；所以關係到的極有可能即是戴（？）姓仕紳所興建的中式大屋。所有以上工程都是在 1880 年 5 月董事會之前即已進行，徐壽只是將這些事項提到董事會來要求事後同意。明顯地，1880 年的

113 〈格致書院招致生徒啓〉，《申報》，1879 年 11 月 1 日。
114 〈格致書院興工〉，《申報》，1879 年 11 月 28 日。

董事會議已成徐壽的橡皮圖章。除了錮藏契據以截流之外，徐壽以興建房屋出租作爲書院的經常性收入來源。接著出納徐壽宣稱，書院是以公共利益爲目的的建築，要求當局免稅。此事由主席擔文行文工部局，徐壽寫信給道台，分別進行。

董事會最後一部份討論事項是與「博覽會」有關的器材設備。主席擔文贈送了 1 套礦石樣本與一系列彩色圖版。傅蘭雅則說到荷蘭公使費果蓀(J. H. Ferguson)數週前訪問書院時，表示將贈送書院 1 套疏濬工作機具模型，不日將自荷蘭運送來華。[115]董事會最後決議：過去預備建造的博覽會大鐵屋目前將擱置，但仍隨時保持注意；秘書並將以董事會名義寫信給倫敦代辦 Bourne & Co.，感謝英國董事會多年來的幫助，但由於當下沒有將這個（博覽會）計畫實現的希望，英國國內董事會應即解散，書院在英國事務轉交在倫敦的麥華陀與偉列亞力。[116]

書院的英國董事會成立於 1875 年 9 月，原來目的便是專爲書院計劃「博覽會部份」，書院的上海董事會中的洋董們在 1876 年初放棄了博覽會與大鐵屋的計畫，但此刻以徐壽爲首的中方董事們仍然對此興致高昂，藉助李鴻章的影響力讓胡光墉在 1877 年捐了 5,000 銀元作爲興建博覽會大鐵屋的經費。1877 年書院的英國董事會另闢蹊徑，縮小博覽會規模，企圖透過駐英欽使郭嵩燾說服中國政府擔保借款。這個嘗試在 1878 年初李鴻章明確回應不支持後擱淺，徐壽必然也在此時放棄了辦博覽會的想法，轉而走向就現有條件先整頓書院。在連中方的支持也消失後，博覽會之夢正式破滅，英國董事會失掉存在的理由，董事會的解散宣告了格致書院博覽會計畫的正式結束。

115 關於如比利時駐華公使 E. Serruys、奧匈帝國駐上海公使 J. Haas、荷蘭駐華公使 J. H. Ferguson 在格致書院董事會的活動，我們大致上可以推斷是經由亞洲文會的中介。事實上，從《北華捷報》所刊登的亞洲文會會議紀錄中，都可以看到這些人的名字反覆出現。

116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Public Meetings, *N.-C. H.*, May 25, 1880, vol. XXIV, New Series, p. 458.

六、Conversazione

1878 年 2 月，當書院董事會得知李鴻章表明不支持書院英國董事會的 2 萬英鎊借款計畫時，董事們已意識到辦展覽（或博覽會）終究要倚靠上海中外人士自己的努力。與會的瑪高溫質疑道，中國參加各國舉辦的博覽會向來透過海關稅務司，董事會是否有可能寄望中國政府不透過這個管道參與此事。當時的董事會主席吉羅福恰爲總稅務司指派籌辦中國參加 1876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的三位海關稅務司之一，所以這段發言其實是針對對博覽會記憶猶新的董事會主席而來的。[117]主席回答道，他認爲北京政府未必會一直透過海關來做這些事情，如果上海博覽會(Shanghai Exhibition)需要協助的訊息能恰當地傳遞給北京政府並得到皇帝的贊同，則書院或許可以從其他管道，甚至直接從北京獲得協助。吉羅福的想法是越過李鴻章或甚至總理衙門的層級，直接上達天聽。接著，他以新近在亞洲文會舉辦的展覽(exhibition)爲例，認爲格致書院即使不靠外力，同樣可能辦得成一個地區性的博覽會，吸引大量贊助，並進一步促成一個有規模的常設展覽誕生。[118]

揆諸日後的發展，吉羅福的想法顯然過度樂觀。但我們必須檢視一下吉羅福所謂的亞洲文會展覽是怎麼回事？1878 年 1 月 27 日，上海的亞洲文會辦了一場聚會，《北華捷報》稱之爲“the first scientific *conversazione* held in Shanghai”（原文以斜體標示義大利文名詞）。[119]conversazione 可以是有些嚴肅的研討會，也可以是不拘形式的談話會、餐會、茶會、聊天，[120]我們暫且將上海的這

117 〈三處稅務司所出爲赴法國賽珍會告示並章程〉，《萬國公報》，冊 6，頁 3611-3613，該期錄光緒 3 年(1877)1 月 27 日至 2 月 3 日《京報》。另兩位爲東海關稅務司德璀琳(G. von Detring)、粵海關稅務司裴式楷(R. E. Bredon)。另見 Ah-Sin, “China and the Paris Exhibition,” extract of 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N.-C. H.*, Mar. 7, 1878, vol. XX, New Series, p. 246.

118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Public Meetings, *N.-C. H.*, Feb. 21, 1878, vol. XX, New Series, p. 187.

119 “Conversazione at the Asiatic Society’s Rooms,” Amusements, *N.-C. H.*, Jan. 31, 1878, vol. XX, New Series, p. 115.

120 George Augustus Sala, *Twice Round the Clock, or The Hours of the Day and Night in London* (London: Houlston & Wright, 1859), chapter- “Eleven O’clock P. M.- A Scientific Conversazione, and an Evening

場聚會稱為雅集。這個在亞洲文會會館中舉行的雅集包括了三個展覽：1. 圖書館——展出科學器具與電器，如電話、電報、電磁實驗器具等；[121]2. 博物館——除了原就是博物館藏的亞洲植物、動物標本、礦石與化石等，還有許多個人收藏借展，如敬妥瑪的化石、瑪高溫的台灣風景照片、Martin 小姐的蝴蝶收藏等；3. 在亞洲文會圖書室中，展出中國與日本的古物與工藝品，這個展覽分為展售品與借展品兩個部份，後一類數量較大且品質較佳，展出內容包括銅器、瓷器、景泰藍、漆器、牙雕、古代刀布錢幣等。在《北華捷報》的報導中，工藝品的展覽描述與其形制沿革的解釋佔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展期只有一天，但根據報導，群賢畢至，仕女雲集。在這場 conversazione 中，有一個人在三個展覽中賣力演出，他便是亞洲文會的新主席、已從格致書院董事會退出的敬妥瑪。我們幾乎要懷疑他是有意向格致書院示威。

《北華捷報》除了報導外，兩週後另有一篇社論討論此事。作者回應讀者的投書，建議中國賑災基金會(China Famine Relief Fund)舉辦一個類似的展覽，以門票收入折抵支出後充作賑金。賑災基金會的起因是 1877 年前後中國北方的大饑荒，許多西方傳教士投入賑濟。[122]有趣的是，《北華捷報》社論以

Party," pp. 300-301; "This (more or less) social reunion is an institution of purely modern invention.... It is not much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ld, its establishment following close on the heels of the fashionable "rout," which again succeeded the "assemblies" of our grandmothers and the "drums" of our great-grandmothers. The modern conversazione means a room or a suite of rooms thrown open for the reception of a miscellaneous mob of fashionables or of celebrities, foreign and native, political, literary, scientific, or artistic. It is a vast menagerie, a "happy family" on a monster scale, a Noah's ark upon dry ground, and the birds, beasts, and fishes crowd and elbow each other, and roar, or yell, or howl, or bark, or low, or grunt, or squeak, or crow, or whistle, or scream, or pipe, to the infinite delectation of the host and hostess."

121 貝爾(Alexander Graham)發明的電話在 1876 年出現，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關於上海接觸西洋新事物速度的概念。

122 在 1877 至 79 年間的大饑荒中，上海賑災委員會由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擔任秘書。〈勸捐賑饑民啓〉，《申報》，1877 年 3 月 10 日；〈書本報歷述山東災荒事後〉，《申報》，1877 年 3 月 12 日；〈勸華商賑銀宜托西人辦理說〉，《申報》，1877 年 4 月 5 日；〈論曾伯輔用李教士囊替晉省賑務〉，《申報》，1878 年 1 月 19 日；"Famine Relief Fund," Public Meetings, *N.-C. H.*, July 28, 1877, vol. XIX, New Series, p. 87；1878 年上半，《北華捷報》刊載了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的 10 次會議紀錄。

亞洲文會爲例所指的展覽，幾乎全集中在工藝品展覽上。作者說道，工業技術與製造的展覽常不如戲劇與音樂會之類的娛樂能吸引大量群眾，但對於藝品展則大可寄與厚望。將賑災與工藝品展覽結合在一起，這不禁令人想起，自 1878 年起開始在《申報》上大量出現的中國書畫助賑與廣告。[123]上述《北華捷報》社論在最後以格致書院作爲對比，說道這個「神祕且奇特」(mysterious and peculiar)的格致書院，如果不是因爲「乖張的經營」(perversely managed)而陷入悲慘的處境，它或許可以成爲一個匯聚「各種努力」(various efforts)的恰當中心。但鑑於現狀，作者認爲已經沒有什麼好再寄望於格致書院的了。[124]

文中所謂的「各種努力」指的是辦展覽會的努力，因此影射的自然是喧騰已久的格致書院「博覽會」。這是在 1878 年 2 月，格致書院董事會主席從吉羅福換爲擔文之際。文中所謂的「乖張經營」指的又是什麼呢？我們懸置這個問題，繼續觀察亞洲文會的第二回 conversazione。[125]這次 conversazione 在 2 月底舉行，爲期兩天，主題是「埃及象形文字與其解譯的各階段」，包括一個展覽與一場演講，展出的是由前亞洲文會主席 Goodwin 的夫人出借給亞洲文會的 1,000 張單色與彩色石版畫中的 300 張。這些圖版源自 1842-1845 年埃及的探險隊，其贊助者普魯士國王腓特列威廉四世不僅支持探險，並資助其成果出版，又因 Goodwin 對埃及學素有研究，特將其中一套贈送給 Goodwin。[126]展出資料來自德國，因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爲何演講者是普魯士人穆德麟(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127]圖版展出兩天後，第三天晚上開始進行演講，之所

123 1878 年 7 月起，出現在《申報》上的書畫助賑廣告超過 50 筆，這個數量與北方饑荒有關，之後數年平均每年有 20 筆助賑廣告。

124 "Another Conversazione,"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Feb. 14, 1878, vol. XX, New Series, p. 153.

125 " Second Conversazione of the N.-C. Branch, R. A. Society," Amusements, *N.-C. H.*, Mar. 7, 1878, vol. XX, New Series, p. 242.

126 此次展出圖版的原書爲在柏林出版的 *Denkmaeler aus Aegyptien und Aethiopien. Nach den Zerchnanger, der von seiner Majestat dem Koenige von Preussen, Friedrich Wilhelm IV. Nach diesen Ländern gesendeten und in dem Jahren 1842-1845, anogegührten Wissenschaftlichen Expedition, auf befehl Seiner Majestat Herausgeben und erläntert von C. R. Lepsius.*

127 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1847-1901)，普魯士人，1869 年抵中國，1869-1874 年間服務於海關，後曾任德國駐天津副領事，1878 年任亞洲文會圖書館館長，1879 年任亞洲文會副主席；"N.-C.

以在晚間舉行，推測是因為使用幻燈機解說。這次展覽與演講學術性相當濃厚，但報導說道不僅觀展者多，聽演講者亦甚眾。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這兩次雅集。第一次的展覽規模大、展期短、沒有演講；第二次展覽規模較小、展期較長、有一場演講；兩次雅集據稱都吸引了大量人潮。第一次雅集看來像個熱鬧的上海社交聚會，賓客們談科學、談最新科技、談自然史、談古董與藝術。第二次雅集中除了觀展群眾外，還有前來聽演講者，他們是誰？其中可能包括：1. 未前來觀看展覽，但原來就對埃及學有興趣並有認識者；2. 看過展覽，但因為本身知識配備有限而什麼都看不懂，但仍對此題材有高度好奇心者；3. 看過展覽，有興趣、覺得有收穫且希望更深入認識者；4. 未前來觀看展覽，但這天晚間在上海找不到其他娛樂者。撇開第四類的看熱鬧者、第一類的行家，另兩類聽（觀）眾使得演講成為兩天展覽成效的指示劑，或反過來講——展覽成為演講的鋪路石，這兩類聽（觀）眾的區別在第一次雅集中卻顯現不出來。因此，在第二次雅集中，conversazione 作為原來義大利文的「對話」性質比第一次更明顯地浮現：展覽成功與否一部份與展品有關，另一部份卻仰賴通常難以成為可掌握研究對象的觀者。在一場對話中，縱有發話者與發話內容，缺乏對應的對話者便不成對話。

亞洲文會的雅集是在上海外僑社群中發生的事，如果換成中國社群會又將如何？回溯 1877 年初，麥華陀離滬返英，途經香港時參觀了香港的博物館 (museum)，並且將比較香港博物館與格致書院的觀感寄信給書院董事會。[128]《北華捷報》一篇社論提到這件事，轉載了信中的描述，摘其大要：香港博物館觀眾摩肩接踵，上海格致書院門可羅雀。[129]在同樣是中國人的社群裡，這個對比不可謂不強烈。該報主筆認為其關鍵在於自由與否，只要中國官方事事作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ublic Meetings, *N.-C. H.*, Feb. 7, 1879, vol. XXII, New Series, pp. 121-123。1882 年由李鴻章推薦出任朝鮮總稅務司：Lee, Yur-Bok, *West Goes East: 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f and Great Power Imperialism in Late Yi Kore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p. 43-47, 193.

128 "The Polytechnic," Public Meetings, *N.-C. H.*, Mar. 15, 1877, vol. XVIII, New Series, p. 268.

129 "The Polytechnic,"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Mar. 15, 1877, vol. XVIII, New Series, p. 261-262.

梗，中國便不可能有自由的報紙、自由的輪船公司，也不會有自由的Polytechnic；上海道台所辦的《新報》、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以及現在在上海推動的格致書院，都是很好的例子。這篇社論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除了自由外，我們必須考慮是否有一些其他差異存在。因此，我們可以參考中國其他與格致書院類似的嘗試。

格致書院的例子在傳教士間引起了一些迴響。除了 1875 年由 H. Budler 主導的廈門讀書室(Amoy Reading Room)外，[130]另一個模仿格致書院的機構是 1878 年由瑞乃爾(Theodore H. Schnell)規劃、李鴻章贊助的芝罘讀書室；廈門與芝罘的讀書室都是單純的圖書閱覽室。1880 年初，《北華捷報》刊登了芝罘讀書室的報告。[131]在報導芝罘讀書室的同日，《北華捷報》也登載了一份社論，比較了以上兩個讀書室與格致書院；作者首先說道，格致書院是由讀書室(Reading Room)轉變成爲綜合技術學院(Polytechnic)，略過這兩個概念結合的背景不談，這個作法事實上並未導向任何有利且實際的結果；對社論作者而言，原因在於書與機器是兩回事：中國人喜愛書，但不信任且畏懼機器，因此上海的讀書室在追求有用的比賽中反而受到附屬於讀書室的綜合技術學院拖累。[132]

合併考量以上幾篇文字，我們很難接受格致書院因設定展覽功能、在書籍之外又增加了機器，而使得發展遲滯的說法。書院董事會曾經嘗試「辦展覽」，但計畫中的「展覽」並未實現，我們更無法從書院開幕展覽的參觀者反應中推斷中國人討厭機器，因爲他們並沒有真的看到多少。即使中國人喜愛書、討厭機器，但指的是包括士農工商的所有中國人嗎？如果 1880 年代所有中國人都

[130] "The Polytechnic- Report," *N.-C. H.*, Oct. 14, 1875, vol. XV, New Series, p. 380; "Amoy Reading Room for the Chinese," Public Meetings, *N.-C. H.*, Dec. 28,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 629.

[131] "Report of the Chinese Reading Room at Chefoo," Correspondence, *N.-C. H.*, Jan. 15, 1880, vol. XXIV, New Series, pp. 30-32。這份報告中紀錄並分析了讀者來自地區的比例、社會階層、供閱讀的書報、引起讀者興趣的書籍種類等統計資料。

[132] "Chinese Reading Rooms,"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Jan. 15, 1880, vol. XXIV, New Series, pp. 30-32.

喜愛書、討厭機器，則我們必須解釋爲何今是而昨非。即便 1880 年代的中國人真的如此，廈門與芝罘的單純讀書室比格致書院確是少了一些令人討厭的機器，但何以解釋香港博物館的中國人潮？雖然引起香港人興趣的是動植物標本而不是機器，但標本實物畢竟不是書。麥華陀的香港博物館觀感暴露了一個基本的問題：所有的展覽都需要分類，亦即按照某種規則呈現的展示，對於一個企圖傳遞知識的展覽，展品的知識分類體系是必要的：鳥類展需要鳥類學、昆蟲展需要昆蟲學、礦石展需要地質學，依次類推。在認識這些「學」之前，所有的觀看都只能是看熱鬧。香港博物館的觀眾中必然有任何「學」都一片空白的看熱鬧者，但應該也有一些已經受過初步教育，前來印證所學者，這些人可以在觀看展覽後繼續拓展其知識，而最正規的管道就是學校教育。

我們可以將香港博物館比擬做上海亞洲文會的展覽，將香港的學校比擬爲亞洲文會展覽後的演講。博物館或展覽會觸發好奇心，演講或學校教育擴大這個藉著好奇心打開的求知窗口，使得求知慾不至中斷。因此，設立博物館或展覽會需要學校，而且是能夠提供滿足前者所引發好奇心的知識的學校。然而，即使格致書院在 1880 年後開始零星開課授徒，縱然再加上廈門與芝罘的讀書室，以及稍晚出現的引介西方新知的學校，這些中國學校並沒有立即導向任何作爲它們互動對象的展覽會。原因可能是構成開設展覽會的條件不僅是有學校教育，還有其他，或許並非任何學校教育都行得通。問題是中國當時的教育究竟比香港少了什麼？簡言之，相對於中國吸收西方新知的點狀結構，殖民地香港的教育是線狀的，接近 1904 年以後中國新式教育的模式。[133]

1880 年，《北華捷報》的上一篇社論談到日本博物館與博覽會的差別，更加強了這個思考方向。作者說道，英國人的保守性格使得他們一向揚中抑日，但如果看日本的「洋流行熱」(foreign fashion mania)，就會震驚於分隔中

133 方美賢，《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香港：中國學社，1975）；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95-221。中國與香港的教育發展差異可以舉一例管窺：中國新教育從京師大學堂起，香港的教育卻是逐步由下而上至 1910 年香港大學的設立。

日的深淵之大，而日本致力西化的最明顯的展現便是其博覽會與博物館。就事證而言，作者首先提到東京湯島大成殿的展覽，一方面是古物，另一方面是「純教育性」(strictly educational)的自然科學展，科學與宗教在此呈現出一個奇妙的並置，孔廟被轉化成一個以大英博物館爲典範的公共讀書室。作者進一步指出另一個更值得注意的例子：東京教育博物館，從教學玩具、樂器、地圖、教科書圖書館，到盲人點字書，展出所有可爲教育所用的器具。[134]從中日比較的角度出發，這自然使該文作者聯想到格致書院未竟的展覽。[135]

關於日本的博覽會與博物館發展史已有相當多的研究，[136]而日本博覽會對中國的影響則還是一個仍待開發的議題。[137]對《北華捷報》社論的作者而言，中國或許年年寄送大批展品參加歐美的萬國博覽會，展品的規模容或勝過日本，但這些似乎都只是下盤虛浮的表面工夫。姑不論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的方式——對象從來不是本國人民，而是其他國家——是否能達到促進工商業發展的目的，就開啓民智的作用而言，中日之間勝負已分。中國唯一差可比擬的格致書院展覽會延宕多年，計畫至 1880 年已成爲泡影，而可以養成「對話者」的教育系統尙遙遙無期。

讓我們回頭檢視前述幾件事，來考量 conversazione 的另一個面向。1.《北華捷報》中關於第一次雅集的報導中，對中日工藝品展覽與觀眾意見交換的描述佔了超過一半的篇幅；2. 基於觀眾對雅集的反應，《北華捷報》社論中建

134 椎名仙卓，《日本博物館發達史》（東京：雄山閣，1988），頁 33-49。

135 "Museum and Exhibition in Japan," Editorial Selections, *N.-C. H.*, June 29, 1880, vol. XXIV, New Series, pp. 652-563.

136 北澤憲昭，《眼の神殿：「美術」受容史ノート》（東京：美術出版社，1989），頁 117；北澤憲昭，《境界の美術史：「美術」形成史ノート》（東京：ブリュッケ, 2000），頁 336。

137 僅以 1875 至 1880 年初《申報》上所登載訊息爲例：〈日本大設博覽會〉，1875 年 2 月 15 日；〈奉勸華人往東洋博覽會說〉，1875 年 2 月 18 日；〈東洋西京長崎開設博覽會啓〉，1877 年 2 月 10 日；〈日本舉行賽珍會〉，1878 年 2 月 14 日；〈論赴博覽會示〉，1879 年 1 月 9 日；〈紀長崎博覽會事〉，1879 年 3 月 31 日；〈長崎博覽會近狀〉，1879 年 5 月 3 日；〈論博覽會有益於地方生意〉，1880 年 1 月 8 日。《申報》上報導日本博覽會的訊息數量雖並不比報導歐美博覽會者更多，但報導性質卻有相當明顯的差異。簡言之，赴日本觀展兼旅遊者有之，如李圭一般有機會赴歐美觀展者少。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 1 輯（六）；長沙：岳麓出版社，1985）。

議將藝術展覽與賑災結合，以前者吸引人群；3. 第二次雅集是一個藝術展覽加上一場藝術史學術演講，展出的是 300 張在《申報》上常被稱爲「洋畫」的黑白或彩色石版畫；[138]4. 自 1878 年起開始在《申報》上大量出現中國書畫助賑廣告。從 conversazione 的對話性質來考量，這是否意味著藝術具有最大的社交潤滑劑效用？或藝術是否是一個最容易或最廉價的對話題材？觀察《北華捷報》中對於亞洲文會在上海活動的報導，我們發現學會每年均舉辦數次的學術演講，這些演講的題材包括文學、文字學、語言學、史學、哲學或自然科學等，基本上是亞洲文會會員的學術發表，並非每次演講都能吸引大量聽眾，遇上冷僻的題材，聽眾更是稀少。相對之下，兩次 conversazione 成功的關鍵似乎是「藝術」展覽。

我們在前言中將展覽分爲形式與內容兩個部份，但藝術展覽無疑是一種最奇特的展覽，其形式的重要性與內容相同——或至少我們可以說其形式和內容在「看得懂」這件事的位階高低並不明顯，沒有多少人會企圖從一河兩岸式的山水中去認識地理；藝術展覽對於對話者的知識配備條件要求也最低——或至少大部份觀者都可以宣稱他們看到了藝術的「美」，我們也很難檢查一個面對藝術品跟著眾人點頭稱是的觀者究竟領會了什麼。這是否意味著藝展將是令中國大眾接受作爲西方新事物的展覽的最佳途徑？

結　論

回顧格致書院成立的經過，開始時的目的其實是傳「世俗教」。麥華陀在書院籌備會議中，堅持書院的性質必須是世俗的，有人質疑爲何必須排除宗教？和傳教士父親同名的麥華陀首先回答：「單憑我 Medhurst 的姓，就足以

---

138 《申報》自 1876 年開始進口並轉售以石版畫爲主的「洋畫」，1877 年 6 月發行大量取材自英國 *Illustrated News of London* 的《寰瀛畫報》，1878 年，點石齋購入新式石印機器，開始大量複製中國書畫；吳方正，〈晚清四十年：上海視覺文化的幾個面向——以申報資料爲主看圖像的機械複製〉，《人文學報》，期 26（2002 年 12 月），頁 49-95。

讓各位相信我不會是反宗教的」，接著強調打著宗教的旗幟反而無法達到傳教的目的。[139]沒有明說的是，以具有普遍性的科學吸引中國人前來，再徐圖傳教之事有兩個優點：一是在洋務運動的背景下，與單純宗教信徒相較，透過科學吸收的中國人有可能在未來有較大影響力；其次是相對於以利多聚者以利空散，科學卻不太會有利空出盡的情況，亦即上鉤者不會輕易鬆口。因此科學在此是傳播宗教的手段，其成果如何則是另一個議題。

其次，當我們將格致書院放在西方人向中國引進西學的脈絡下，則書院的構想以北京益智會爲借鑑。1872 年成立的北京益智會模仿英國的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藉出版廉價書刊向一般民眾推廣實用知識。這個早期的啓蒙嘗試顯然遭遇了一些困難，以致於同年年底上海的西人提出了公共圖書館的建議。公共圖書館一方面使流動的書刊集中在一地，另一方面，以有限的會費與自由閱覽使得書刊進入公眾領域。當麥華陀開始構思一個爲中國人開設的公共圖書館時，他求助於當時上海的西方知識分子菁英社群。在書院的第一份章程中，圖書館（讀書室）、輔助性的科學收藏與演講其實都是亞洲文會多年來的活動內容。從某方面而言，這樣一個以 School for Search after Knowledge 爲名的圖書館，令人聯想到 1753 年成立的大英博物館。

當書院的英文名稱改爲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時，書院的性質有了重大的改變，在原始規劃之上，展覽被加了進來。爲了展覽，書院董事會求助於英國與歐洲的工商界。另一方面，直接向英國與歐洲商人要求贊助在中國「傳世俗教」，恐怕會得到如同直接向中國人傳教的結果，因此展覽——或說得模糊曖昧的博覽會——是用來吸引英國與歐洲商人的手段，這個手段接著膨脹到幾乎吞噬了目的。傅蘭雅唯恐將博覽會辦成雜貨店(bazaar)，事實上大概也代表亞洲文會大部份成員的態度：展示必須置入有導引、有目的觀看的渠道。經由一個以教育大眾爲目標的機構所辦的展覽，著重的是展覽的教育面向。如果展覽有可能成爲無目的的看熱鬧，不如不辦。

---

139 "A Reading Room for Chinese," *N.-C. H.*, Mar. 26, 1874, vol. XII, New Series, pp. 270-271.

但是，有導引、有目的觀看意味著觀看展覽是用來印證、補充已經獲得的知識。在書院的修正計畫中，一方面讀書室(reading room)與演講授課(lectures & classes)擔負以文字語言傳遞知識的任務，另一方面展覽(exhibition)則以實際可見事物印證知識的言說。即使不過度簡化地將它化約爲實驗科學路徑，這種十分倚重視覺化資訊與經驗的學習方式，可說與當時中國傳統書院的抽象思考有革命性的不同，差異在「格致」兩字。劉錫鴻未必有膽量宣稱反對宋明理學，但他對格致的定義從傳統抽象思考的角度出發，格致書院的「格致」因而被當成零散瑣碎的低等格致。即便如此，我們不禁要猜想，如果格致書院成功推動它博學審問的教學方式，將會對中國的知識體系構成多大的變因？或至少在視覺文化方面產生多大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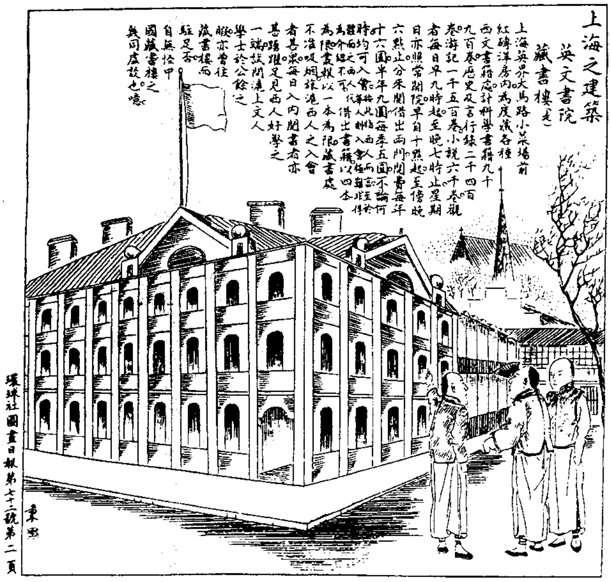
格致書院自籌設至 1878 年初，董事會雖兼由中西董事組成，但書院的發展方向基本上由主要來自亞洲文會會員的西董主導，中方董事除了募款之外，幾乎從未扮演任何積極角色。在書院「博覽會」迭遭阻滯之際，亞洲文會憑著有限的當地資源，成功地證明了教育性質的展覽——或 conversazione——是實際可行的。但是這些展覽籌劃者專注於展覽本身，卻未曾自覺到組成展覽觀眾的上海外僑社群擁有與展覽對話的能力。在展覽這件事上，亞洲文會的成功與格致書院的失敗，顯示博覽會牽涉到許多社會條件的配合，將這件西方新事物引進中國的複雜程度，遠超過單純地將物品送往外國參展，即中國過去數十年參與博覽會的方式。1878 年起徐壽控制董事會，代表的是這個由西方人發起、規劃、籌辦的書院，正式進入洋務運動時期引進西學的「改良中國式」運作方式，找尋阻力最小的途徑前進。具有象徵意義的是，伴隨這個重大改變的是博覽會（或博物館）計畫的徹底放棄。

在格致書院博覽會的案例中，對博覽會有興趣的英國人和中國人各有不同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中國最早的一個博覽會嘗試是搭著（傳）教——育的便車來的。這個博覽會不成功的因素很多，表面上原因之一是經費缺乏，其次是缺乏籌劃博覽會的經驗，但隱而不顯、卻具有決定性的原因卻是中國人

尙未接受「透過觀看」的學習途徑，或者說尙未能接受其負面的副作用。最後的這個現象的研究並不在本文所能處理的範圍內。1910 年，中國興辦南洋勸業博覽會，時値中國推動新教育、設學部、[140]推動實業、設農工商部之後數年，這些時間點的接近顯示舉辦博覽會條件的到位。相對地，格致書院未成功的博覽會是中國在博覽會方面的一個重要經驗，因爲一部份與博覽會相關的社會條件——尤其是教育——在這個過程中逐一遭到檢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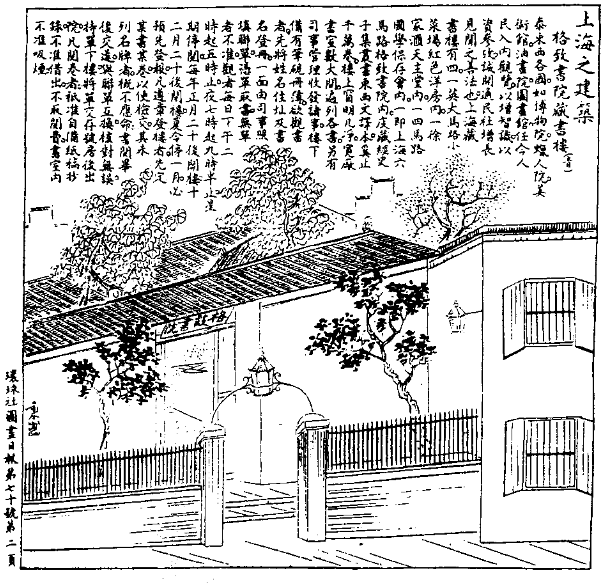
140 吳方正，〈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藝術教育——圖畫與手工〉，收入顏娟英主編，《上海美術風雲七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年 12 月審查通過，出版中）。

圖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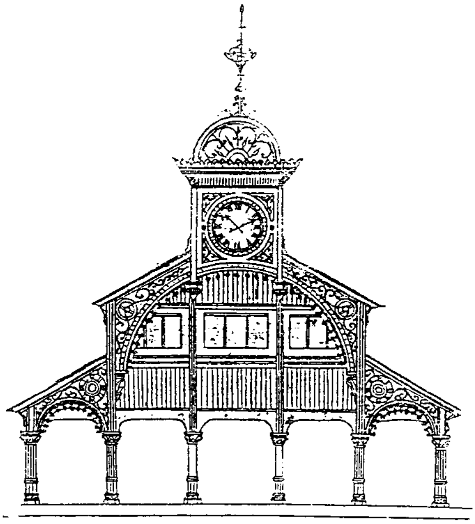
亞洲文會與圖書館。《圖畫日報》，1909年，第72號，頁2。

圖　二



格致書院。《圖畫日報》，1909年，第70號，頁2。

圖 三



格致書院博物院大鐵屋（？）。《格致彙編》，第 2 年，1877 年 2 月，頁 7。

圖 四

亞洲文會博物館。《圖畫日報》，1909年，第65號，頁2。

徵引書目

一、史料

《申報》，1873-1880。

《格致彙編》。南京：古舊書店影印本，1992。

《教會新報》。台北：華文書局，1968。

《萬國公報》，1874-1878、189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編，《外交檔案目錄彙編》。冊 1，編號 01-27，「各國賽會公會」，原總理各國事物衙門檔案，同治 5 年 7 月～民國元年 8 月；編號 02-20，「各國賽會公會」，原外務部檔案，光緒 27 年 8 月～民國 2 年 6 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李 圭，《環遊地球新錄》，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 1 輯（六）。長沙：岳麓出版社，1985。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 1 輯（四）。長沙：岳麓出版社，1984。

劉錫鴻，《英軺私記》，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 1 輯（七）。長沙：岳麓出版社，1986。

環球社編輯部編，《圖畫日報》，1909-19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99。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北華捷報》），1872-1880。

二、專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方美賢，《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香港：中國學社，1975。

王 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刊（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汪敬虞，《唐廷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宓汝成編，《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上冊，清同治 2 年——光緒 26 年(1863-1900)。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40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黃光域編著，《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梁元生，《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

梁元生著，陳同譯，《上海道台研究：轉變社會中之聯繫人物，1843-18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北澤憲昭，《眼の神殿：「美術」受容史ノート》。東京：美術出版社，1989。
北澤憲昭，《境界の美術史：「美術」形成史ノート》。東京：ブリュッケ，2000。
椎名仙卓，《日本博物館發達史》。東京：雄山閣，1988。
The China Directory for 1874, Fourth Annual Publication, New Series. HongKong: "China Mail" Office. Reprinted;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Frampton, Kenneth. *Modern Architecture 1851-1945*.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3.
Goodman, Nelson. *Languages of Art: An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ymbol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76.
Greenhalgh, Paul. *Ephemeral Vistas: The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Great Exhibitions and World's Fairs, 1851-193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Lee, Yur-Bok. *West Goes East: 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f and Great Power Imperialism in Late Yi Kore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Mignot, Claude. *L'Architecture au XIX^e siècle*. Paris: Office du Livre, 1983.
Sala, George Augustus. *Twice Round the Clock, or The Hours of the Day and Night in London*. London: Houlston & Wright, 1859.
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三、論文

于醒民，〈《萬國公報》的主筆是林樂知嗎？〉，《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5 年第 1 期，頁 81-85。
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入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古偉瀛，〈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個側面〉，《思與言》，卷 24 期 3，1986 年 9 月，頁 249-266。
吳方正，〈晚清四十年上海視覺文化的幾個面向——以申報資料爲主看圖像的機械複製〉，《人文學報》，期 26，2002 年 12 月，頁 49-95。
吳方正，〈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藝術教育——圖畫與手工〉，收入顏娟英主編，《上海美術風雲七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年 12 月審查通過，出版中。
馬　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珍藏「西文漢學舊籍」簡介（三）〉，《史林》，2001 年第 4 期（總第 64 期），頁 108-109。
馬　敏，〈清末第一次南洋勸業會評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頁 73-78。
陳　絳，〈唐廷樞與輪船招商局〉，《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頁 31-64。
黃新憲，〈《萬國公報》與中國教育的近代化〉，《南京師大學報》，1996 年第 1 期，頁 57-60。

趙祐志，〈躍上國際舞台：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25，1997 年 6 月，頁 287-344。

鍾少華，〈中國第一次博覽會：南洋勸業會〉，《歷史月刊》，期 41，1991 年 6 月，頁 98-103。

Biggerstaff, Knight.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hinese."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5:2, May 1956, 收入其專書 *Some Early Chinese Steps toward Modernization*.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5, pp. 69-91。

Godley, Michael R. "China's World's Fair of 1910: Lessons from a Forgotten Event." *Modern Asian Studies* 12: 3, 1978, pp. 503-522.

Lazich, Michael C. "E. C. Bridgman and the Coming of the Millennium: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Knowing the Time, Knowing of A Time*, 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Millenni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December 6-8, 1998.

Summers, David. "Representation." In R. S. Nelson & R. Shiff, eds.,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四、網路文件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http://wwwedit.wmin.ac.uk/static/history.asp.

陳　同，〈略論近代上海外籍律師的法律活動及影響〉，《史林》，2005 年第 3 期。www.historyshanghai.com/admin/WebEdit/Uploadile/0530T.pdf。

楊代春，〈《萬國公報》研究綜述〉，《湖南大學學報》，2001 年第 3 期，2005 年 2 月上網。http://www.cass.cn/jindaishisuo/show_News.asp?id=5924。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Its "Exhibitions"

Wu Fang-cheng*

Abstract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was one among many initiatives in the 1870s to bring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o China. Its origins were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Western community in the Shanghai Settlement, more specifically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e Institution's initial program was to promote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through a public library and reading-room. Then, by supplementing the reading-room with scientific equipment and models, the nature of the establishment was changed into a complex kind of school,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the London Polytechnic.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thus planned operations on three levels: first, the library and reading-room; second, lectures and classes; and third, the exhibition of machinery, equipment and manufactured goods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This last aspect gained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point that it absorbed the greatest portion of both the energy and the resources of the Institution's governing board. It also marked the first attempt to stage a public exhibition in China.

After efforts that lasted for six years, the board abandoned the exhibition scheme. But many requirements for exhibitions, whether educational or commercial, were revealed in this seeming failur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Institution's exhibition in relation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library and lectures on scientific subjects.

Keywords: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exhibitions

*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Studi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